

沈默迷宮：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 記憶文化的形塑與變遷*

潘宗億**

世人檢視二戰國家面對侵害人權之戰爭罪責的處理模式，經常比較德國與日本個案，從而肯定德國正視並承擔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罪責的反省態度。然而，若將視野轉移到1949年至1969年間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1876-1963)及其所屬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執政時期，將窺見西德官方與大眾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迴避與沈默態度，實與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 1913-1992)於1970年的「華沙之跪」(Kniefall von Warschauer)所體現的積極面對與悔罪姿態有天壤之別。在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一方面「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另一方面「選擇性記憶」二戰德國集體受害苦難經驗，並將戰爭罪責

*本文曾於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在2017年11月10日至11日主辦之「第13屆文化交流史：戰爭、流離與再生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從《拆彈少年》到《沈默迷宮》：戰後德國艾德諾時代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為題發表，今經刪減與修訂後投稿《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並獲得兩位匿名審查者的修改意見，使本文之論證得以更臻完善。本文為本人執行科技部計畫「戰後德國艾德諾(Konrad Adenauer)時代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建構與變遷」(107-2410-H-259-002-)研究成果一部分，執行計畫期間幸得林宜貞、林恩羽、陳迦勒、楊婧函與沙妮禪等研究助理於文獻蒐集與整理等各方面之細心襄助，方得順利完成相關研究與論文撰寫，特此致謝。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大眾史學研究中心主任。
聯絡方式：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No. 1, Sec. 2, University Road, Shoufeng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97401, Taiwan [R.O.C.]

完全歸咎希特勒與納粹黨政軍菁英，甚而有「清白國防軍」(saubere Wehrmacht)之集體認知迷思。然而，為何戰後1950至1960年代的西德官方與大眾形成與「華沙之跪」如此顯明迥異的態度呢？或者，戰後德國官方何以遲至1969年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才逐漸正視猶太人大屠殺及其遺緒的態度呢？

基於本文論旨，其第二部分首先藉《沈默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之解讀與詮釋，呈現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特徵，作為問題探詢的切入視角。其次，第三部分進一步探析西德官方於艾德諾時期「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與「選擇性記憶」以德國戰俘為中心的二戰集體受害苦難經驗的形塑脈絡，以及兩者之間互為交織之紋理，並時與《沈默迷宮》對話。第三，第四部分探究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呈現在歷史學術論著、歷史教科書、口述訪談紀錄、影視文藝、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等官推與大眾文化記憶媒介之上的整體趨勢。第四，第五部分以史家論著與小說作品舉證隱沒於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下的對抗性另類記憶文化，藉以呈現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複雜性、多元性與變遷性。最後，結論歸結本文論點，同時兼及未來可延伸探究的方向。

關鍵詞：猶太人大屠殺、謊言迷宮、記憶文化、轉型正義、大眾史學

一、前言

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於二十世紀戰後德國持續在「不可能記憶」與「不可能遺忘」之間擺盪著。¹

從長時期的歷史縱深眼光來看，現代德國自終戰以來並非始終以正視態度面對納粹德國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等國家暴力遺緒，諸如猶太人、同性戀與辛提和羅姆人(Sinti and Roma)大屠殺相關國家級紀念碑，歷經兩德統一以來的眾聲喧囂，於二十一世紀初，始先後出現在首都柏林的政治象徵中心布蘭登堡門(Brandenburger Tor)周遭城市地景之中。²德意志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在其內部左右兩派政治競合、兩德關係變化，以及冷戰和歐盟國際政治因素牽絆下，呈現不斷變遷而複雜的發展與左右擺盪，前後歷經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1945-1949)的納粹戰罪宣傳與去納粹化、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1876-1963)時期(1949-1969)的回避與沈默以對、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布蘭特(Willy Brandt, 1913-1992)與施密特(Helmut Schmidt, 1918-2015)時期(1969-1982)的積極面對與悔罪、基督教民主聯盟柯爾(Helmut Kohl, 1930-2017)時期(1982-1989)的迂迴曲折而相對化和常

¹ 這裡的「不可能記憶」與「不可能遺忘」的提法，挪用自猶太人大屠殺史家佛里德蘭德(Saul Friedländer)之語：「在過去四十三年以來，兩世代的德國人深陷於『不可能記憶』與『不可能遺忘』之間。」參閱：Saul Friedländer, *Memory, History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of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

² 「歐洲被迫害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落成於2005年，「納粹時期被迫害同性戀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verfolgten Homosexuellen)落成於2008年，「恐怖地形圖」(Topographie des Terrors)落成於2010年，「納粹時期歐洲被迫害 Sinti and Roma 紀念碑」(Das Denkmal für di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ermordeten Sinti und Roma Europas)落成於2012年，都座落於柏林政治與象徵中心，亦即布蘭登堡門周圍地區。相關討論可參閱：潘宗德，〈新德國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以柏林浩劫紀念碑為中心的探討〉，《南開史學》，第2期(北京，2019.12)，頁246-282。

態化取向，以及兩德統一之後(1990-)的眾聲喧囂等五個時期。³兩德統一之前的東德，受制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反猶主義為核心的反法西斯論述，將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視為資本主義極端型態，亦即法西斯主義的結果，難以彰顯其種族滅絕特質，而其受害者也無法與反法西斯共黨和蘇聯戰爭英雄相比，故而遭受邊緣化的命運。⁴在此宏觀脈絡之下，戰後西德歷經二十年迴避而沈默對待二戰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於 1970 年代出現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的轉折，之後又遭遇 1980 年代保守力量之迴盪退縮，終在兩德統一之後浮現各種二戰記憶的眾聲喧囂。是故，猶太人大屠殺於二十世紀戰後德國持續在「不可能記憶」與「不可能遺忘」之間擺盪，而戰後德國經驗也說明，國家暴力與人權受害者相關歷史與記憶之恢復與處理，其路程可能漫長而崎嶇，並無捷徑。

1970 年 12 月 7 日，隸屬社會民主黨的西德總理布蘭特在華沙起義紀念碑(Pomnik Powstania Warszawskiego)獻花致敬時，突然下跪為納粹德國的猶太人

³ 本文對於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歷史分期，主要在胡昌智於〈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一文中的四階段論之基礎上，並參考以下論著略有調整，參閱：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David Cesarani, *After Eich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Holocaust since 1961*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Robert R. Shandley, ed., *Unwilling Germans? The Goldhagen Deb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Jeffrey Herf,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aniel Jonah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出版社，2016)；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國史研究通訊》，第 10 期(臺北，2016.06)，頁 81-90；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6 期(臺北，2006.11)，頁 233-257；孟鍾捷，〈統一後德國的身份認同與大屠殺歷史爭議——1996 年“戈德哈根之爭”〉，《世界歷史》，第 1 期(北京，2015.01)，頁 55-68。

⁴ Anne Rothe,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East German Official History,” in Louise O. Vasvári and 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 eds., *Comparative Central European Holocaust Studies*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9-94; Jeffrey Herf, “Politics and Memory in West and East Germany since 1961 and in Unified Germany since 1990,” *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23, no.1 (2004): 40-64.

大屠殺公開道歉與悔罪，史稱「華沙之跪」(Kniefall von Warschau)。布蘭特的驚天一跪，不但深植世人記憶，更成為當代認知戰後德國公開承認錯誤，且積極正視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罪責的重要象徵。⁵從而，世人檢視二戰國家侵害人權罪的處理模式時，經常比較德國與日本個案，並肯定德國直接面對並承擔猶太人大屠殺罪責的積極反省態度，反而批判日本對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的忽視、迴避與否認姿態。⁶然而，類此比較與觀察，均未能中肯反映德、日兩國戰後二戰記憶文化之全貌及其變遷本質，而是簡約化與選擇性歷史管窺的結果。

若將歷史眼光的視野轉移到 1949 年至 1969 年間艾德諾及其所屬基督教民主聯盟執政時期，亦即本文所稱艾德諾時期，將可窺見西德官方與大眾面對大屠殺的集體迴避與沈默態度，與西德總理布蘭特於 1970 年 12 月 7 日的「華沙之跪」所體現的積極面對、反省與悔罪姿態相較之下，實有天壤之別。在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一方面「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另一方面「選擇性記憶」德國戰俘受困蘇聯集中營、德勒斯登(Dresden)大轟炸等盟軍空襲，以及德裔難民被迫從中東歐遷徙返回德國等集體二戰受害苦難經驗，並將戰爭罪責完全歸咎於希特勒與納粹黨政菁英，甚而有「清白國防軍」(saubere Wehrmacht)之認知迷思，⁷藉以合理化德國集體受害、無知、無罪之訴求。然而，為何戰後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形成如此與「華沙之跪」正視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迥異態度呢？或者，戰後德國官方何以遲至 1969 年社會民主黨執政時期，才逐漸正視猶太人大屠殺及其遺緒呢？

⁵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頁 73、77。

⁶ 相關討論可參閱：Sebastian Conrad, "Entangled Memories: Versions the Pas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5-200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 no.1 (2003): 85-99; Sebastian Conrad, *The Quest for the Lost Nation: Writing Hist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trans. Alan Nothnagl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⁷ 即使到 1995 年，65 歲以上的德國受訪者中，63% 仍認為德國國防軍未參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參見："Die Jungen denken anders," *Der Spiegel* (Hamburg), 8 May 1995, 19,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ie-jungen-denken-anders-a-171b56e6-0002-0001-0000-000009184264>, 擷取日期：2023 年 10 月 25 日。

在二戰終戰與猶太人解放七十週年，以及法蘭克福(Frankfurt)奧許維茲大審(Auschwitzprozesse)結束五十週年之際，德國出現《沈默迷宮》(*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⁸此一以法蘭克福大審前史為背景且再現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與大眾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歷史電影。2014年9月6日，由瑞奇爾利(Giulio Ricciarelli)編導的《沈默迷宮》於多倫多國際影展首映，同年11月起在德國等歐洲國家正式上映，引起廣泛注意，且至2015年十月，德國票房累積達一百七十五萬餘美元，全球票房四百一十二萬餘美元，並曾獲2015年德國電影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與最佳劇本等大獎，還代表德國角逐2016年奧斯卡外語片提名。⁹

《沈默迷宮》根據歷史改編，再現法蘭克福奧許維茲大審之前的五年偵調過程，從中彰顯在艾德諾時代「畫下底線」(Schlußstrich)的官方主宰性論述之下，西德司法與警政體系人員對納粹戰罪的迴避與冷漠態度，以及社會大眾在1950年代經濟奇蹟下集體遺忘猶太人大屠殺的趨勢。劇中主人翁萊德曼(Johann Radmann)一角雖為虛構，但實以法蘭克福大審相關檢察官沃蓋爾(Georg Friedrich Vogel, 1926-2007)、庫格勒(Joachim Kügler, 1926-2012)與韋澤(Gerhard Wiese, 1928-)為原型，而其中韋澤本人也擔任電影顧問，劇中也不時穿插他的記憶。¹⁰此外，電影中的主要角色法蘭克福檢察廳總長鮑爾(Fritz Bauer, 1903-1968)、記者聶卡(Thomas Gnielka, 1928-1965)與曾任國際奧許維茲委員會(International Auschwitz Committee, 簡稱 IAC)秘書的朗拜(Herman Langbein, 1912-1995)，也都是奧許維茲集中營實際調查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是故，從文化記

⁸ *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 在臺灣根據英文片名譯為《謊言迷宮》，本文則根據德文片名稱其為《沈默迷宮》，參見：Giulio Ricciarelli, dir., 《謊言迷宮》(臺北：海鷗，2016)。

⁹ 《沈默迷宮》票房統計數字，參見：「數字(The Numbers)」網站，<https://www.the-numbers.com/movie/Im-Labyrinth-des-Schweigens#tab=international>，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¹⁰ Eckhard Fuhr, "Auschwitz? Ich wusste herzlich wenig," *Die Welt*(Berlin), 5 November 2014, <https://www.welt.de/kultur/kino/article134029933/Auschwitz-Ich-wusste-herzlich-wenig.html>, 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Hans Riebsamen, "Viele Filmhelden und ein echter Hel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Frankfurt), 6 November 2014, <http://www.faz.net/aktuell/rhein-main/im-labyrinth-des-schweigens-ein-echter-held-13250264.html>, 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憶的視角，本文將《沈默迷宮》定義為相關歷史之文化記憶媒介的大眾歷史書寫，並嘗試藉由其具體情節與關鍵對話切入，呈現法蘭克福大審之前檢察官調查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犯五年之間展露的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特徵，並從中提出本文嘗試釐清的問題。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在《沈默迷宮》詮釋與問題探詢的基礎上，透過官文書、報刊、史學論著、文藝創作與相關研究論著等文獻材料之分析，具體呈現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進而探析其形塑與變遷的脈絡，並分析其在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變遷歷程上的時代意義。

本文的核心分析概念，主要綜合並援用阿博瓦胥(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和艾斯曼(Jan Assmann, 1938-2024)的「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學理意涵延伸定義而成。其中，「記憶文化」意指特定時空脈絡下，個人或社會群體對選擇性特定過去及其意義認知的主宰性歷史論述，經文藝化、視覺化、儀式化、物質化或空間化轉譯於各種文化生產品形式之文化記憶媒介，進而形成跨時間與社群向度的文化記憶，且其具社群性、多元性、建構性與變遷性等歷時性特徵，而緣於社會內部政治權力結構翻轉與外部國際政治局勢變化，或導致特定時空記憶文化之更張、對特定過去的選擇性記憶與遺忘，以及主流與另類歷史論述之隱沒或浮現。¹¹據此，本文將《沈默迷宮》定義為西德戰後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與大眾歷史書寫。

基於本文論旨與核心分析概念意涵，其第二部分首先藉《沈默迷宮》之解讀與詮釋，呈現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特徵，作為初步問題探詢之切入視角。其次，第三部分進一步探析西德官方於艾德諾時期「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與「選擇性記憶」以德國戰俘為中心的二戰集體

¹¹ Maurice Halbwachs,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in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Lewis A. Cos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5-189; Maurice Halbwachs,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rancis J. Dit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51-52; Jan Assmann and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1995): 125-133; 有關阿博瓦胥的「集體記憶」與艾斯曼的「文化記憶」等學理概念的詳細討論亦可參閱：潘宗億，〈歷史記憶研究的理論、實踐與展望〉，收入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臺北：聯經，2019)，頁 247-283。

受害苦難經驗的形塑脈絡，以及兩者之間互為交織之紋理，並時與《沈默迷宮》對話。第三，本文第四部分，在《沈默迷宮》劇情的基礎上，探究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呈現在歷史學術論著、歷史教科書、口述訪談紀錄、影視文藝、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等文化記憶媒介之上的整體趨勢。第四，本文第五部分以史家論著與小說作品舉證隱沒於具主宰性之艾德諾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下的對抗性另類記憶文化，藉以呈現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複雜性、多元性與變遷性。最後，本文結論一方面歸結本文論證要點，同時兼及未來延伸考察之可行方向。本文之論證聚焦於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的西德，東德部分猶待另文處理，而本文提及德國時，根據所涉時空脈絡實多指西德，或有時指涉兩德分治之前與兩德統一之後的德意志國家，而在論述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整體發展與變遷時或以德國指稱，特此說明。

二、《沈默迷宮》中的問題

《沈默迷宮》之情節內容，主要由五部分構成。第一部分鋪陳法蘭克福檢察廳檢察官萊德曼自 1958 年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犯的緣起與歷程，並從中體現西德司法體系乃至大眾對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集體無知與冷漠。影片伊始即呈現大屠殺倖存者西蒙克許(Simon Kirsch)在學校附近巧遇當時正任教職的前奧許維茲集中營武裝黨衛隊(Die Waffen Schutzstaffel)隊員舒茲(Alois Schulz)，並在三次報警無人處置之後，由記者聶卡帶領西蒙前往法蘭克福檢察官辦公室檢舉，但卻沒有檢察官願意受理，而檢察長在趕走聶卡與西蒙之後更暴怒道：「同盟國對納粹斬草除根是事實，聶卡對祖國根本毫無忠誠」(00:07:47)。¹²

為何在 1950 年代末西蒙三次舉報納粹集中營的武裝黨衛隊隊員，警察機關卻未做處置？為何法蘭克福檢察廳沒有檢察官願意受理西蒙的檢舉案？為何檢察長又如此暴怒？1950 年代末的法蘭克福檢察官對猶太人大屠

¹² 意指此處所引臺詞出現於電影《沈默迷宮》影片 7 分 47 秒處，此後不再另外說明。

殺戰罪的集體冷漠，與 1970 年代初西德總理布蘭特的「華沙之跪」對照之下，其態度何以如此迥異？

面對法蘭克福檢察官的冷漠態度，聶卡將檢舉信函丟擲地上，隨即被檢察廳秘書棄於垃圾桶，但卻被萊德曼悄悄從垃圾桶中拾起，成為開啟四年多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犯的契機。假若檢舉信被棄置垃圾桶象徵戰後西德艾德諾時代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迴避與冷漠態度，則萊德曼從垃圾桶拾起檢舉信的動作則象徵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即將轉折的開端。

有趣的是，拾起檢舉信的萊德曼卻明顯對奧許維茲集中營情事毫無所知，但他仍展開一連串資料搜集，嘗試偵辦舒茲的案件，但卻在彰顯德國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無知，此為《沈默迷宮》第二部分的劇情主軸。一經查證，萊德曼發現舒茲二戰間的資料全部消失，於是前往美軍管理的資料中心查找資料，並遭到美軍軍官奚落，諸如「你們也曾是納粹」、「一但戰敗馬上變成好人」、「你爸就曾是納粹」與「戰後人人都成了反抗鬥士」(00:08:40)等讓萊德曼摸不著頭緒的說辭。

到美軍資料中心查證舒茲身分未果的萊德曼，在檢察總長鮑爾主持的會議提及舒茲一案，檢察長隨即表示要轉教育部處理，示意萊德曼不必理會，但也引起鮑爾注意。之後，萊德曼遇到聶卡，向他表示已處理舒茲一案，且舒茲已遭學校停職，但聶卡卻表示懷疑。不放棄又無知的萊德曼追問：「你要控訴他什麼？你覺得他殺了誰？」(00:11:41)面對萊德曼的追問，聶卡反問：「他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待過……你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00:11:44)萊德曼則回答：「那不是受保護的居留營區嗎？」(00:11:48)啞口無言的聶卡非常驚訝，開始追問幾位年輕人是否知道奧許維茲，結果無人知曉，故跟萊德曼說：「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暴行，竟是輕易地否認與遺忘，一個德國檢察官不知道奧許維茲曾發生的事，就是個恥辱。」(00:12:20)這段對話是本片關鍵，具體呈現 1950 年代末西德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無知。但是，為何像萊德曼一樣的西德年輕世代都不知道奧許維茲集中營的侵害人權情事？

對於奧許維茲集中營無知，但又不願放棄的萊德曼繼續追查，發現舒茲並未停職，並詢問檢察長，而檢察長則表示那是教育部的責任，也不是萊德曼該管的事，萊德曼又說「但舒茲在奧許維茲待過……」，檢察長則回應：

「這類營區隨處都是，美國跟俄國也有啊，我也在法國的營區待過一年。」(00:13:53)比萊德曼資歷稍長的海勒(Otto Haller)則進一步說：「戰後我被迫看過一部關於這類事件的電影，盡是些政令宣導片，戰勝者所編造的故事。」(00:14:08)電影第二部分最後，檢察總長召見萊德曼，提醒他要留意「公部門到處都是納粹，大尾到小咖，無所不在」(00:16:23)；正如《沈默迷宮》全片所呈現。

在電影第三部分，萊德曼與瑪琳(Marlene)陷入情網，並開始在證據搜查上有所突破，開始進行大規模偵辦工作，期間遇到聶卡感嘆道：「我真不懂，這(奧許維茲集中營猶太人大屠殺)¹³怎麼能夠當成秘密呢？」聶卡回答：「怎麼能？很簡單啊！大家都幹過跟舒茲一樣的事啊！他們把制服一脫，假裝沒事繼續過生活，沒人過問，因為沒人想知道。」(00:17:08)聶卡的回答，或許說明了德國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集體無知的可能因素。

某日，萊德曼受聶卡之邀前往舞會，並在舞會後與聶卡護送西蒙回家，並在西蒙家找到奧許維茲集中營的武裝黨衛隊名單，成為突破調查瓶頸的破口。萊德曼請警方協助抓人，卻被拒絕，甚至把名單當作桌子腳墊，再次呈現警政人員的冷漠態度。除了續找證據之外，萊德曼開始訪談各地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也隨聶卡前往嫌疑犯住處偵查，發現對方只是一般麵包師傅。

眼見萊德曼開始進行大規模偵訊，檢察長卻有所質疑，否定調查的意義。萊德曼表示他偵訊的對象都是「數千起謀殺案的目擊證人」(00:37:47)，檢察長則認為在納粹德國時期「我們別無選擇，只要敢反抗的人都殺了」，更何況「戰後這些在紐倫堡都解決了」(00:38:00)，並指稱萊德曼的調查，「只是扳開德國剛結痂的傷口」(00:38:44)。再一次，檢察長質疑追究猶太人大屠殺戰罪的意義，並強調在紐倫堡大審時都已「處理」過了。為何檢察長如此堅持猶太人大屠殺已經處理過了，因而沒必要再做任何追究？

為了查找奧許維茲集中營證據，萊德曼再次到美軍資料中心，向美軍軍官表示他正在調查奧許維茲集中營情事，對方隨即向他表示，「沒人想碰那件事，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並稱「就維持現狀吧！希特勒都作古了，我們目前的敵人是蘇聯。」(00:40:21)在萊德曼的堅持下，美軍軍官仍帶領他

¹³ 括號中文字為本文作者所加，以利讀者精確理解文意。

至檔案室查看六十萬武裝黨衛隊的資料。萊德曼震撼地發現，奧許維茲是「由 8000 個零件所組成的殺人機器，大大、小小、官僚、行刑者都是……」(00:42:05)何以美軍軍官面對堅決調查的萊德曼，竟說出「沒人想碰那件事」？而且是「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又何以說出「我們目前的敵人是蘇聯」之論？另一方面，萊德曼發現奧許維茲是「由 8000 個零件所組成的殺人機器」，正呼應聶卡所云「大家都幹過跟舒茲一樣的事啊！」之語。

電影第四部分呈現萊德曼偵辦方向轉而執著於追捕有「死亡天使」(Todesengel)之稱的奧許維茲殺人魔王醫生門格勒(Josef Mengele, 1911-1979)。因萊德曼嘗試說服西蒙擔任證人時，耳聞西蒙懊悔自己在奧許維茲集中營親手將雙胞胎女兒交給看起來像天使的殺人魔王門格勒，卻慘遭諸如被注射各類細菌與病毒、在沒有麻藥狀況下被開腸破肚、腦袋被針插入、像雙胞胎一樣被縫在一起等生理實驗，(00:42:05)萊德曼再次感到震驚，發覺集中營中除了像「零件」的一般人之外，還有像惡魔般的殺人兇手，於是緊追門格勒不捨。

由於偵辦規模龐大，總長向檢察長要求調派海勒支援，但卻遭拒絕。檢察長表示，海勒可以幫忙處理許多案件，無法協助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案，總長表示該案被列為最優先，檢察長則以「連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了，該為這不幸事件畫上底線，審訊將是毒藥。」(00:51:09)鮑爾檢察總長則憤怒表示：「完全相反，隱瞞才是毒藥，毒害我們尚待茁壯的民主。」(00:51:18)

至此，觀眾終得知檢察長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冷漠態度實有所本，亦即「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的「畫下底線」政策。然而，若電影情節屬實，為何艾德諾總理主張以「畫下底線」的態度面對猶太人大屠殺呢？我們又如何理解鮑爾檢察總長異於官方的態度與論述呢？這些問題的解答，是理解戰後德國二十餘年間官方與大眾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關鍵，也是本文探究核心。

眼見萊德曼專注於追捕門格勒，鮑爾示意他應鎖定小人物。然而，萊德曼始終固執，且在警政部門處處碰壁，沒人願意幫忙到阿根廷逮捕門格勒。雖追捕期間有人通風報信，但總在最後一刻錯失良機。鮑爾對此非常生氣，再次告誡萊德曼，此事牽扯範圍甚廣，非其所能掌控，尤其「門格勒、艾希曼跟其他人，都受到有權勢的朋友保護者，一個都不能信。」(01:01:22)鮑爾更向萊德曼重申，偵辦方向要鎖定小人物：「德國人必須正視曾犯過的罪行，

不僅是希特勒或希姆萊做幹的，而是那些自願、未遭脅迫，且尚未被定罪的尋常庶民，這是我們所該做的，一場大型審判……」(01:17:52)鮑爾再次強調猶太人大屠殺罪犯不僅止於納粹黨政菁英，還及於一般庶民小人物。

在電影第五部分，萊德曼最終放棄追捕門格勒，但卻發現父親曾是納粹一員，也發現聶卡曾待過奧許維茲集中營，因而逐漸出現認同危機。在放棄追查門格勒之後，萊德曼找到舒茲在集中營的照片，順利逮捕舒茲、穆卡等人，又遭檢察長冷言冷語，再度強調其偵調工作「傷及社會」，但萊德曼則堅持「要讓一切謊言和所有沈默……到此為止。」(01:20:42)檢察長與萊德曼之間的爭執，儼然世代衝突，象徵在納粹時期已成年之世代與戰後成長或出生的年輕世代之間，在面對猶太人大屠殺態度上的衝突，就如檢察長質疑萊德曼：「你是要所有年輕人都去質疑自己父親是否是個謀殺者嗎？」(01:20:35)然而，就在此刻，萊德曼母親告知他的父親「別無選擇」也是納粹，並從美軍資料中心獲得證實。同時，灰心喪志的萊德曼因納粹一事與女友吵架，並宣稱女友父親所屬的 211 先鋒部隊在波蘭也曾涉入大屠殺，而此與戰後西德「清白國防軍」的集體認知有所扞格。再者，萊德曼又發現聶卡在少年時代也曾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工作，可見德國大眾集體涉入猶太人大屠殺的程度。

多重打擊之下，萊德曼陷入認同危機，一度放棄檢察官工作，轉職到律師事務所，但隨即回心轉意，在西蒙鼓勵下和聶卡去奧許維茲集中營唸悼文給西蒙的親人。奧許維茲集中營之旅，讓萊德曼發現調查與審判的最重要意義不在於判刑，而是讓世人知道受害者的故事與奧許維茲集中營的真相。最終，經過萊德曼、海勒與鮑爾的努力，法蘭克福大審於 1963 年 12 月 20 日開庭，而電影也結局於此，對於大審過程及其結果並無具體著墨。

綜上所述，《沈默迷宮》不但再現法蘭克福大審前史種種，更具體呈現審判前法蘭克福檢察官對抗西德官方「畫下底線」政策之下隱身在司法、警政與情治體系的重重納粹遺緒，逐步突破偵辦困境的歷程，明顯可見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迴避與冷漠態度。同時，《沈默迷宮》也呈現 1950 年代末對抗艾德諾時期主流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對抗性另類態度，諸如鮑爾與聶卡主張正視德國一般大眾集體涉入猶太人大屠殺的戰罪問題，以及對於「清白國防軍」集體迷思的顛覆。

然而，何以電影中的檢察長稱像奧許維茲「這類營區到處都是」，而萊德曼也稱其為「受保護的居留營區」？何以檢察官海勒稱戰後關於猶太人大屠殺的「政令宣傳片」都是「戰勝者所編造的故事」？何以大部分法蘭克福檢察廳的檢察官主張盟國已完全處理了猶太人大屠殺罪責問題，而反對萊德曼繼續追究？為何 1950 年代末德國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呈現諸如「假裝沒事繼續過生活」、「沒人過問」、「沒人想知道」等集體趨勢？電影中美軍軍官面對追查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罪的萊德曼，何以說出諸如「你們也曾是納粹」、「一但戰敗馬上變成好人」、「你爸就曾是納粹」與「戰後人人都成了反抗鬥士」等奚落之語？他又何以稱「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碰猶太人大屠殺？又甚而指稱「就維持現狀吧！希特勒都作古了，我們目前的敵人是蘇聯」？當萊德曼追查奧許維茲集中營相關情事之際，何以法蘭克福檢察總長鮑爾提醒他「公部門到處都是納粹，大尾到小咖，無所不在」？這些情節之虛實，以及艾德諾時期「畫下底線」政策的歷史脈絡為何？若置於艾德諾時期以集體沈默、逃避與冷漠為特色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下，我們又如何理解同時期 1960 年代法蘭克福大審出現的脈絡與意義呢？如何理解萊德曼與檢察總長鮑爾所代表的另類態度，以及官方主流記憶文化與對抗性記憶文化同時共存的現象呢？

三、集體沈默與訴不盡的集體受害經驗？

1949 年 5 月 23 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在美、英、法支持下成立，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進入基督教民主聯盟艾德諾時期。艾德諾為戰後基督教民主聯盟領導人，在 1949 至 1963 年擔任西德總理，而其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政策與論述，大抵為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 1897-1977)與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 1904-1988)等繼任總理所延續，故本文稱 1949 年至 1969 年為基督教民主聯盟艾德諾時期。然而，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的「去納粹化」、「再教育政策」與紐倫堡大審，對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具延續性影響，更是解答上述《沈默迷宮》相關諸多問題的記憶政治脈絡。

(一)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去納粹化」與紐倫堡大審

跟在日本一樣，二戰結束後，美國在同盟國軍事佔領時期處理德國戰罪的政策，對西德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發展影響甚鉅。¹⁴首先，盟國管制理事會(Allied Control Council)在戰後除了審判德國戰犯，也積極肅清納粹意識形態，並全面解除德國軍備，解編所有軍事組織。更要者，在去納粹化政策下，許多納粹黨員失去從事公職的機會。¹⁵最要者，美國在美、英、法佔領區內進行「再教育政策」，巡迴播放揭示納粹集中營暴行的紀錄片，並散發宣傳海報，呼籲德國大眾面對納粹罪責。¹⁶例如，有一張宣傳海報搭配呈現納粹德國戰爭暴行的照片，以斗大標題寫著「這些罪行，你們有罪！」(Diese Schandtaten: Eure Schuld!)，並宣告：「……你和你的同胞都要負起戰爭爆發的責任。我們的士兵見證了駭人聽聞之事，而你們卻說你們不用負責。」¹⁷宣傳德國戰罪的紀錄片與文宣，直指德國集體罪責，反面彰顯當時德國大眾逃避戰罪的心態。

其次，紐倫堡大審的結果，也對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造成影響。紐倫堡大審於 1945 年 11 月 20 日至 1946 年 10 月 1 日進行，期間僅起訴納粹黨政軍高層等 24 名主要戰犯，其中 12 名獲判死刑，9 名各種監禁刑期，3 名無罪。¹⁸紐倫堡大審之目的不在於審判德國人民集體罪責，而在於定罪納粹黨政軍高層，故納粹基層人員都免遭起訴，也未涉及一般人民。當時，被起訴者曾抱怨他們被迫承擔罪責，而於 1953 年出版《最後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 1953)一書討論納粹戰罪的瑞特林格(Gerald Reitlinger, 1900-1978)，也提醒世人避免僅注意納粹黨政軍高層罪責，而忽略其他諸如「國防軍」、納粹政權下非軍事部會組織，以及一般德國人民的戰犯，因為僅靠納粹黨政

¹⁴ Sebastian Conrad, "Entangled Memories: Versions of the Pas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5-2001," 87.

¹⁵ 有關「去納粹化」政策之推行及其意義，可參閱：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頁 66-69。

¹⁶ 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頁 83。

¹⁷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49.

¹⁸ Adalbert Rückerl,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1978: A Documentation*, trans. Derek Rutter (Heidelberg: C. F. Muller, 1979), 26-27.

軍組織，規模如此龐大的「最後解決方案」無法想像。¹⁹但是，不論紐倫堡大審的結果如何，確實為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迴避戰爭罪責，提供了體制性藉口，正如《沈默迷宮》中檢察長所稱，戰罪問題「在紐倫堡都解決了」。

而且，紐倫堡大審並不受德國大眾歡迎，雖期間大屠殺暴行資訊大量披露，但納粹戰罪並未成為當時德國公共論述核心。針對盟國對德國集體戰罪的指控，德國大眾大部分也無法接受，²⁰直指紐倫堡大審是「勝利者的正義」，且主張盟軍在戰爭期間對德國的大規模空襲，造成大量平民傷亡，也同屬戰罪。²¹在戰後重建家園之際，德國大眾對紐倫堡大審感到氣憤且冷漠以待，寧願「為自己與家人尋找食物與住宿的地方」²²。以「勝利者的正義」看待紐倫堡大審的心態，也呈現在《沈默迷宮》中海勒檢察官以「戰勝者所編造的故事」指稱盟軍推行「再教育政策」期間播放的「政令宣傳片」一幕情節。

(二)「畫下底線」：艾德諾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論述

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與論述，具體而微見諸首任總理艾德諾於 1949 年 9 月 20 日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議會的就職演說。²³在其通篇演說之中，三分之二強的篇幅多著墨於經濟、金融、外貿、農業、食品、稅改、社會福利等政策之說明，²⁴直到中後段落才約略談及納粹德國的罪責問題，且雖主張「在國家社會主義與戰爭時期的罪犯應受嚴厲懲治」，

¹⁹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38.

²⁰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in Dan Michman, ed.,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32.

²¹ 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2.

²² Adalbert Rückerl,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1978*, 36.

²³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in Karl-Rudolf Korte, ed., *Das Wort hat der Herr Bundeskanzler: Eine Analyse der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von Adenauer bis Schröder*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277-298; 此處引用線上數位版本，以下不再贅述，請參見：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978-3-322-90251-1_11.pdf，擷取日期：2017 年 7 月 24 日。

²⁴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77-289.

但花更多篇幅批評「去納粹化」政策，稱其「造成許多不幸與損害」，並轉而強調戰時與戰後許多德國人遭受的「磨難」，甚而考慮進行「特赦」納粹戰犯，避免他們淪為次等人，以消弭德國內部「兩種階級區分」的社會狀態，²⁵故而針對納粹戰罪定下「將過去留在過去」的方針，而此即《沈默迷宮》中檢察長所稱「畫下底線」政策。²⁶其次，艾德諾進而指出，滯留蘇聯集中營的德國戰俘與戰後被迫從中東歐遷徙的德裔難民遭受的苦難，才是真正「嚴正而重要」的問題，故將設法讓身陷蘇聯的 150 萬至 200 萬戰俘盡快回家，並解決 1,200 萬中東歐德裔難民的身心創傷，否則必造成政經動亂。²⁷再者，艾德勒揭櫫重新融入西方國際政治聯盟與防禦體系的「西向政策」，主張與西歐國家維持良好關係，解決德法衝突問題，並協助建立歐盟體系，早日成為其中一員。²⁸綜觀艾德諾就職演說，對納粹戰罪僅輕描淡寫，且未觸及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重點反而在於批判「去納粹化」政策，並著墨解決難民身心受創與解救德國戰俘的重要性。

在積極推動與歐美國家和解以重新融入戰後西方國際政治聯盟與防禦體系的「西向政策」之下，艾德諾推動賠償(Wiedergutmachung)猶太人大屠殺受難者的政策。1951 年 9 月 27 日，艾德諾在德國聯邦議會宣稱西德政府清楚意識到猶太人在納粹德國時期遭遇的苦痛，以及承擔道德與物質賠償責任的意願，但引發德國內部、甚至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內反對，質疑鉅額賠償非戰後重建中的德國所能負擔，且將導致德國民眾的怨恨與反猶主義的再興。²⁹艾德諾於 1951 年 9 月 6 日對基督教民主聯盟中央的講話中也表示，雖德國在法律上「沒有義務」賠償猶太受害者，確有道德義務，以宣示德國人都不贊成納粹大屠殺暴行，而德國也有賠償以色列國家的責任，因為以色列因德國之故而必須接受來自德國與歐洲的猶太難民與所致沉重財政負擔。最後，艾德諾指出，西德將與以色列簽署宣言，宣示從今爾後，猶太人與德國之間的過

²⁵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89.

²⁶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90.

²⁷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91-292.

²⁸ Konrad Adenauer,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297-299.

²⁹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1996): 1015-1016.

去都將成過去，且再次強調與以色列建立友善關係之必要性，否則將嚴重阻礙德國建立良好形象以重返國際政治的努力。³⁰換言之，西德賠償猶太人受害者與跟以色列建立良好關係，有其道德與政治之必要性，同時可讓「猶太人與德國之間的『過去』成為『過去』」。³¹

³⁰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36; 爾後幾番周折，西德與以色列終於在 1953 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並於 1953 年 3 月 4 日聯邦議會中票決通過。但是，在總計 358 名議員中有 238 票贊成雙方建交的條約，而 34 名來自極右派、新納粹、極左派與共產黨的議員則投下反對票，另有高達 86 名議員棄權。由此可見，戰後德國社會仍存在著反猶情緒，而且不分左、右派，參閱：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61.

³¹ 1952 年 9 月 10 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艾德勒與以色列外長夏里特(Moshe Sharett, 1894-1965)在盧森堡市政廳(Luxemburg City Hall)簽訂《盧森堡協定》(Luxemburger Abkommen)，且基於援助以色列國家安置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難民的初衷，雙方達成西德賠償以色列與猶太人大屠殺受害者之協議，並自 1953 年 3 月 20 日起十二年，以物資與外匯等形式賠償 34.5 億馬克。然而，西德與以色列進行賠償協議談判，在以色列國內也引起激烈爭議。尤其，民族主義右翼黨派赫魯特黨(Herut)政治領袖比金(Menachem Begin, 1913-1992)堅決反對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與西德進行賠償協議談判，稱有民族尊嚴的猶太人，不應遺忘猶太人二戰苦難，而與德國人進行猶太人大屠殺相關賠償協商。比金的言論引起大眾關注與部分支持，但務實的總理本·古里安則認為，保守猶太人歷史、榮譽與尊嚴的形式不一，且考量以色列經濟已近崩潰，更需大量經費安置猶太難民，再加上以色列與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的衝突隱患，以及美國期待西德重建民主政府穩固西方民主陣營聯盟的冷戰國際政治等因素，若德國賠償金有利猶太國家以色列之穩定與安全，也是爭取正義的一種形式。雙方陣營的爭論在 1952 年 1 月 7 日國會票決相關議案時達到高潮，開會期間辯論激烈，其中比金認為背棄猶太人記憶與過往神聖性的猶太國家，將失去靈魂與存在的理由，而本·古里安則認為，以色列作為一個猶太國家，應超越猶太人大屠殺往前看、繼續前進。最終，1 月 9 日，以色列國會(Knesset)以六十一票對五十票通過與德國進行賠償協議談判的議案。此般情勢擾動以色列國內政治與面對猶太人大屠殺遺緒的態度，但也確實對以色列的港口、鐵路、水力、航運、漁業等基礎建設與整體經濟成長有所助益。相關討論可參閱 Daniel Gordis, 胡宗香譯，《以色列：猶太民族的千年建國之路》(臺北：聯經，2023)，頁 232-234；Jacob Tov, *Israel and the Question of Reparations from Germany: Post-Holocaust Reckonings (1949-1953)* (Boston: De Gruyter, 2023), 53-78, 142-149, 263-362. 在此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醒，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的西德就猶太人大屠殺戰罪賠償的問題，實涉及冷戰國際政治脈絡下以色列內政及其官民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還有以色列跟美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其間效應複雜，故由以色列國家的立場與視角進行討論有其必要，但限於本文論旨與篇幅所限，僅以上簡述概論，未來猶待另文深究。

艾德諾處理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與政策充滿曖昧性，對 1950 至 1960 年代的西德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影響深遠。他一方面緣於國際政治考量，回應西方人道主義與人權期待，而主張賠償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與以色列國家，³²但另一方面，作為西德反共領導人，他在類似就職演說這樣的公開場合，卻盡量迴避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此兩手策略，一面討好美國，以利西德重新融入國際政治，另一面對內鞏固多數對大屠殺迴避與沈默以對的德國大眾，以作為西德建立反共民主堡壘的中間力量。

艾德諾對猶太人大屠殺的迴避態度，也有其選舉與西德重建等因素考量。如此一來，他可以取得特赦遊說團體，以及對猶太人大屠殺持迴避或沈默態度的德國公民選票。同時，為了讓納粹時期的人力資源成為西德重建即戰力，反對追究納粹戰罪，甚而進行特赦，或為合理的考量，但也因而邊緣化猶太人大屠殺問題。³³民主反共堡壘之鞏固與國家重建乃艾德諾政府重要國策，於是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成為不可直接面對之重，故而經濟的復原與民主的穩定，優先於面對納粹戰罪。³⁴

基於國家重建目標，將前納粹份子重整到德國社會，成為穩定政局的重要因素。因此，艾德諾在就職演說批判「去納粹化」政策，指其將導致前納粹黨員戰犯淪為次等人而無法融入戰後德國社會，甚或將導致納粹主義之復甦與德國大眾對第三帝國的懷舊情懷。³⁵是故，正如艾德諾就職演說所示，西德官方堅信為了國家重建與穩定民主體制之建立，勢必要將前納粹份子重整到德國社會之中。因此，未受審判的前納粹黨員得以重返德國社會，並在政府與各領域扮演要角，也因而出現《沈默迷宮》劇情中檢察總長鮑爾對萊德曼的警示：「公部門到處都是納粹，大尾到小咖，無所不在」。

此外，戰後西德官方與大眾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的集體沈默態度之形塑與鞏固，也有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因素。由於西方民主陣營國家建立「北大西

³²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19.

³³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in Dan Michman, ed.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14.

³⁴ Gordon Craig, *The German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82), 36.

³⁵ Jeffrey Herf,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224.

洋公約組織(簡稱「北約」)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的現實需求，希望將西德納入，德國不但得以重新融入西方國際政治體系與「再軍事化」，更有利艾德諾政府在國際選擇性忽視與包容之下，合理化其消極面對或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³⁶此一冷戰國際政治因素對西德國內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影響深遠，正如《沈默迷宮》中的美軍軍官眼見萊德曼積極調查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犯時，卻向萊德曼聲稱「沒人想碰那件事，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並力勸他「維持現狀」，因為「我們(德國與美國)目前的敵人是蘇聯」。

因此，艾德諾時期以「畫下底線」政策為核心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正如《沈默迷宮》所呈現，直接反映在司法體系的集體冷漠與迴避態度之上。1958 年左右，艾德諾正面回應特赦戰犯的遊說活動，將無意處理納粹戰犯的官員置於司法機關重要位置，納粹戰犯訴訟與定罪案件數量因而急遽減少。1950 年至 1962 年，西德總共調查了約三萬名前納粹份子，其中 12,846 人被起訴，真正接受審判的則有 5,426 人，而其中 4,027 人被判無罪。雖根據不同資料統計數字略有不同，但高比例無罪判決與相對少數的重型判決是明顯趨勢，而且被宣判有罪者中，只有 155 名被告獲判謀殺罪。³⁷另一項資料則指出，1951 至 1955 年間，大部分判刑都是少於五年監禁的輕刑，許多應認定為謀殺罪的罪行，都獲判幫助或教唆謀殺罪。猶如《沈默迷宮》劇情所呈現，由於艾德諾政府「畫下底線」政策的影響，資深檢察官不會積極主動調查納粹戰罪，因他們多數如萊德曼的父親一樣曾是納粹黨員，而同時期多數資淺檢察官，則不瞭解或不知道猶太人大屠殺，無從或不想主動偵辦相關案件。³⁸在 1956 至 1968 年期間擔任法蘭克福檢察總長的鮑爾，也具體指出西德戰後二十年司法體系公共檢察官在追查猶太人大屠殺戰罪上顯得「厭倦而

³⁶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19; Jeffrey Herf, "Politics and Memory in West and East Germany since 1961 and in Unified Germany since 1990," 41;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69-70.

³⁷ Fritz Bauer, "Im Namen des Volkes. Die strafrechtliche Bewältigung der Vergangenheit," in Helmut Hammerschmidt, ed., *Zwanzig Jahre danach: Eine Deutsche Bilanz, 1945-1965* (Munich: Desch, 1965), 303-304; 轉引自：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15.

³⁸ Adalbert Rückerl,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1978*, 36.

缺乏熱情」³⁹，而其主因有二：第一，大部分司法調查多屬因緣巧合，例如個別猶太人受害者的檢舉；第二，紐倫堡大審讓德國人心生納粹戰罪調查已經結束之感，而此正如上文所提。⁴⁰因此，正如史家弗雷(Norbert Frei)所言：「自從來自佔領勢力的壓力逐漸減弱之後，亦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之後，原本西德司法體系於懲凶相對可觀的嘗試，迅速停滯下來。相對地，一股排山倒海而來『畫下底線』的呼籲開始出現。」⁴¹此番趨勢正巧妙地再現於《沈默迷宮》劇情之中，資淺檢察官萊德曼對奧許維茲集中營罪犯的偵辦從垃圾桶的一張紙條開始，而其偵辦過程又屢遭長官與同事冷眼與批判。

(三)選擇性記憶德國集體受害苦難：以戰俘為中心

艾德諾就職演說的另一重點，在於對德國戰俘與中東歐德裔難民受難經驗的強調。在其就職演說中，艾德諾強調德國人在戰時與戰後的受害苦難，包括至 1949 年仍被關押在蘇聯集中營的 150 萬德國戰俘，以及 1,200 萬被迫從波蘭、捷克、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遷徙回德的德國裔難民。⁴²為此，艾德諾政府成立「聯邦流離失所者、難民與戰爭傷害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 Flüchtlinge und Kriegsgeschädigte)處理相關問題。以戰俘與難民為主體的利益團體迅速成為重要社群組織，立意爭取社會福利資源，也積極建構戰俘受害者的集體記憶。⁴³艾德諾政府致力於妥適照顧德國戰爭受害社群，

³⁹ 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15.

⁴⁰ 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16.

⁴¹ Norbert Frei, "Der Frankfurter Auschwitz Prozess und die Deutsche Zeitgeschichtsforschung," in Fritz Bauer Institute, ed., *Auschwitz: Geschichte: Rezeption und Wirkung* (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96), 124; 轉引自：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13-14.

⁴²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43-44; Jarausch Konrad H. and Michael Geyer, *Shattered Past: Reconstructing German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197-220.

⁴³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20.

但對猶太人納粹受害者卻不置一詞，⁴⁴因而在德國內部形成受害者階層化現象，德國人受到選擇性的強調，而猶太人則被邊緣化。

戰後德國集體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冷漠、迴避與沈默態度，跟德國軍民在戰爭時期的苦難經驗不無關係。就軍方而言，國防軍死亡人數總計達 300 萬至 530 萬，其中 80% 死於戰爭最後兩年，而作戰中失蹤人數則達 150 萬，其中一半死於東戰線，另一半死於戰俘集中營。⁴⁵此外，戰後初期受困蘇聯集中營的德國戰俘超過 300 萬，另外 800 萬則受困於西方盟國的戰俘營，其中約 100 萬人死亡。⁴⁶就一般人民而言，在戰爭最後兩年的盟軍空襲中，死亡人數保守估計達 50 萬至 100 萬，另外 1,200 萬德裔難民被迫從中東歐遷徙過程中死亡人數也達 50 萬，大量婦女也遭強暴等暴行對待。⁴⁷如此大量軍民死傷、失蹤與流離，形成不可承受而難以癒合的集體創傷。因此，於重建中療傷止痛已猶不及，更不用說要面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罪責。

德國人民在戰爭期間的集體受難經驗，深深影響德國人民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構成德國人集體受害論述的歷史與心理基礎。⁴⁸由於這些集體經驗，德國人在戰後專注哀悼自身受害苦難，更甚於正視猶太人大屠殺浩劫，甚而許多德國人認為他們的苦難並不亞於猶太人。例如，1947 年 9 月，來自西德 Hildesheim 小鎮的 Frau R. 在寫給一個天主教神父的一封信中，表露極大痛苦，並深信在戰場上失蹤的十八歲兒子，正被關在蘇聯德國戰俘集中營，

⁴⁴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36.

⁴⁵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19, 43;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11.

⁴⁶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20;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11.

⁴⁷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5, 43; Elisabeth Krimm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r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9;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33; Jörg Friedrich, *The Fire: The Bombing of Germany, 1940-1945*, trans. Allison Brow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⁴⁸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11.

而根據一位返回德國的蘇聯集中營戰俘，她相信德國戰俘的處境和德國集中營根本無法比較，甚至更為悲慘，尤其 150 萬至 200 萬人死於飢餓與處決，並聲稱：「這樣的待遇有比在德國集中營好嗎？」⁴⁹

這種德國人受難程度不亞於猶太人大屠殺的認知，甚至到終戰五十週年之際，仍然存在於德國大眾。根據《明鏡》週刊(*Der Spiegel*)於 1995 年 5 月的民意調查，受訪者中 44% 受過小學教育以上的德國人，認為 1,200 萬德裔難民被迫從中東歐強迫遷徙回德國的苦難，猶如猶太人大屠殺，都是同樣巨大的非人道罪惡，其中 40% 超過 65 歲。⁵⁰

戰後艾德諾時期西德大眾專注二戰受害苦難而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的態度，在法蘭克福大審期間也同樣可見。根據 1964 年 6 月的一項民調，40% 受訪者完全沒有關注報紙、廣播或電視有關法蘭克福大審的報導。同年 7 月的民調也顯示，83% 的德國民眾聽過大審，但其中卻只有 42% 知道大審在法蘭克福進行。⁵¹到了 8 月，知道法蘭克福大審的受訪者中，則有 39% 反對大審的進行，而其中 45% 來自 35 至 54 歲年齡層。⁵²在第三帝國時期已成年的世代，皆認為大審「破壞我們(德國)的國際聲譽」，或「只是浪費錢」，且認為「終於是時候到此為止」。⁵³1965 年初的民調也顯示，57% 的德國民眾反對出現更多納粹戰犯審判。⁵⁴換言之，大部分德國人並不關注大審，少數關注者則反對類似審判，尤以在第三帝國時期已屆成年世代為然，而德國大眾對法蘭克福大審的冷漠與反對，正反映艾德諾政府的「畫下底線」政策，猶如《沈

⁴⁹ 轉引自：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52.

⁵⁰ “Die Jungen denken anders,” *Der Spiegel* (Hamburg), 8 May 1995, 19,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ie-jungen-denken-anders-a-171b56e6-0002-0001-0000-000009184264>, 擷取日期：2023 年 10 月 25 日。

⁵¹ “Wer weiß etwas über den Auschwitz-Prozeß? Jugend nicht gut informiert,” *Die Welt* (Berlin), 9 July 1964; 轉引自：Devin O. Pendas, *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 1963-1965: Genocide, History, 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53.

⁵² “Vom Auschwitz-Prozeß nichts gehör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rankfurt), 14 August 1964; 轉引自：Devin O. Pendas, *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 1963-1965*, 254.

⁵³ “Ablehnung der KZ-Prozesse wächst,” *Frankfurter Rundschau* (Frankfurt), 14 August 1964; 轉引自：Devin O. Pendas, *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 1963-1965*, 254.

⁵⁴ 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253.

默迷宮》中，面對萊德曼之積極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戰罪，檢察長直言：「連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了，該為這不幸事件畫上底線，審訊將是毒藥。」

針對戰後德國大眾迴避並冷漠對待猶太人大屠殺，並關注自身戰爭及其遺緒所致苦難經驗與記憶的態度取向，米徹利希夫婦(Alexander Mitscherlich, 1908-1982; Margarete Mitscherlich, 1917-2012)從心理分析視角提出解釋。在《無能悼念》(*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一書中，他們指出德國大眾以逃避與沈默態度面對納粹罪責，意在壓抑始終存在但不被正視的罪惡感。亦即，戰後德國大眾出現一種「認知受迫害與戰爭受害者，而非感知造成這些受害者的罪惡」的壓抑心態，藉此將焦點轉向自身受害經驗，以逃避戰爭與大屠殺罪責。⁵⁵換言之，為了逃避或壓抑面對自身戰罪的罪惡感與責任，並加以合理化，戰後二十年德國大眾轉而強調自身的戰爭受害經驗，而非正視猶太人大屠殺罪責。

此外，戰後盟軍佔領時期以來可能涉及司法調查與審判的恐懼，也讓西德大眾傾向對猶太人大屠殺沈默以對。據統計，納粹黨保守估計有八百五十萬至千萬黨員，其中除了二十五萬武裝黨衛隊成員之外，另約九萬德國人民遭司法調查，由於牽連範圍甚大，大部份德國人寧願對猶太人大屠殺保持沈默或迴避。對大多數未直接涉入納粹戰罪的一般德國人民，為避免讓自己或親友受到牽連，也寧可旁觀不語。⁵⁶此般心理趨勢，正可徵諸《沈默迷宮》中美軍軍官所稱「你們也曾是納粹」、「一但戰敗馬上變成好人」、「你爸就曾是納粹」與「戰後人人都成了反抗鬥士」等說辭，亦正如劇中記者聶卡所言：「大家都幹過跟舒茲一樣的事啊！他們把制服一脫，假裝沒事繼續過生活，沒人過問，因為沒人想知道。」

戰後西德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邊緣化，並不意味德國官方與大眾完全不記憶二戰與納粹德國時代。他們記憶，但從德國人視角出發選擇

⁵⁵ 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The Inability to Mourn: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trans. Beverley R. Placze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59; 德文版出版於 1967 年，參閱：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Die Unfähigkeit zu trauern: Grundlagen kollektiven Verhaltens*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 1967).

⁵⁶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10-11.

性記憶二戰集體受害經驗。因而，諸如猶太人等其他受害族群便相對遭到選擇性忽略與遺忘。尤其，德國軍民在戰時與戰後的苦難，不但構成德國集體受害記憶的核心，也是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與部分大眾面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態度取向的重要脈絡。由此觀之，德國二戰集體受害記憶實乃戰後廣大德國大眾「由下而上」的戰爭苦難經驗，以及艾德諾政府有意識「由上而下」運用德國集體受害經驗之間互為表裡與辯證交織的結果。

記憶與遺忘如同硬幣之兩面，正當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與大眾「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罪責之際，另一方面則「選擇性記憶」戰時與戰後的集體受害經驗，其中又以深陷蘇聯集中營的德國戰俘苦難及其相關紀念為主要核心。正如艾德諾就職演說所示，搶救德國戰俘回家，乃西德重要國策之一。戰後受困蘇聯的德國戰俘少則 150 萬，多則超過 300 萬，而西方盟國也監禁了至少 800 萬德國戰俘，而 1,100 萬戰俘中至少約 100 萬人死亡。蘇聯官方則稱德國戰俘死亡人數為 356,678 名，但根據近來研究成果，僅運送過程中死亡而未登記在案的戰俘人數，就高達 75 萬名。⁵⁷

但是，在艾德諾政府執政初期，多數德國戰俘已陸續被釋放，何以戰俘苦難經驗與記憶仍構成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與大眾二戰記憶文化的核心呢？雖根據 1929 年的日內瓦公約，盟國在戰爭結束後應馬上釋放戰俘，但基於德國戰時造成的大規模破壞，盟軍國家於戰後初期仍決定運用免費的德國戰俘人力於各國重建之中，而這也說明了何以《沈默迷宮》中的檢察長回應萊德曼指控舒茲的奧許維茲集中營經歷時，會不以為然的聲稱「這類營區隨處都是」，且「美國跟俄國也有」，而他自己也在「法國的營區待過一年」。

直到 1947 年，盟國在莫斯科舉行外相會議才達成在 1948 年底前開始釋放德國戰俘的協議。爾後，至 1950 年，大部分西方盟國的德國戰俘已被釋放，並分別返回兩德，而自東歐與蘇聯被釋放的德國戰俘，則約有 200 萬，後續於 1950 年至 1956 年間，另外約 2 萬 6 千名被蘇聯法庭判定為戰犯的德國戰俘才陸續被釋放，其中最後一批遲至 1956 年 1 月才歸國。根據塔斯社於

⁵⁷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4, 20;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11.

1950年5月5日刊載的蘇聯官方報告，自1945年起，蘇聯共釋放了1,939,063名德國戰俘，另外13,536名戰俘因判刑或等待審判而仍被監禁。⁵⁸換言之，在艾德諾執政初期，大部分戰俘已被釋放，只剩下約1萬3千名至2萬6千名戰犯仍受困蘇聯，但艾德諾卻宣稱蘇聯官方未清楚說明150萬德國戰俘的命運，而他所稱150萬，實際上是戰俘加上作戰中失蹤人口的數量。然而，蘇聯仍有150萬德國戰俘受困的認知，在艾德諾政府政治論述宣傳下深植德國大眾人心，成為當時德國二戰集體受害苦難記憶與官方論述的核心。⁵⁹

因此，在西德官方與公共論述中，獲釋返國的德國戰俘成為蘇聯不義暴行的倖存者與英雄。西德不分政治與宗教立場，一體認同蘇聯戰俘集中營倖存者，歡迎最後一批戰俘歸來的群眾也綿延八十公里，而此一戰俘得以回歸的時刻，也成為戰後西德統合與政權合法性的象徵。自1946年中起至1950年5月，1,125,352名歸鄉的德國戰俘中，737,513名回到西德，387,839回到東德，而最後一批9,626名德國戰俘中，多數的7,250名也選擇回到西德。⁶⁰雖並非所有獲釋戰俘都能跟家人重聚，也非所有回歸戰俘都能在身心健康地重回社會，但官方論述在在選擇性強調戰俘跟家人團聚和重返社會的歡樂意象，更將回鄉的德國戰俘形塑為蘇聯不義暴行的倖存者與英雄。

於是，營救滯留蘇聯德國戰俘回家，成為艾德諾政府的重要政績。在西德政治與媒體宣傳下，最後一批德國戰俘得以成功獲釋，看起來是艾德諾不斷斡旋與協商的成果，實際上是冷戰政治下西德納入北約體系與蘇聯調整外

⁵⁸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1, 45, 179.

⁵⁹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180.

⁶⁰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205-206, 209-210, 212-213.

交政策的雙重有利環境的結果，⁶¹但根據一項 1967 年的德國民意調查，75% 受訪者肯定營救蘇聯德國戰俘是艾德諾最重要的政績。⁶²

然而，以德國戰俘為核心的德國二戰受害論述，在艾德諾執政之前已存在於德國社會。戰後初期，德國各種宗教與政治社群為了國家重建，操作德國二戰受害苦難記憶，諸如天主教與德國福音教會，常舉辦歡迎歸來戰俘的紀念、禱告活動，一方面感念他們「無法言傳的貢獻與苦難」，⁶³同時另一方面暗批盟軍不義戰爭暴行與「去納粹化」政策。例如，1946 年 9 月，德國福音教會舉辦戰俘禱告週活動，悲嘆德國人民的悲慘遭遇，12 月即與天主教會共同發起釋放德國戰俘連署活動，並積極搜集戰俘資訊，向盟軍陳情釋放戰俘。⁶⁴由此觀之，戰後西德教會組織揭櫫的德國二戰集體受害論述，可謂艾德諾時期形塑以德國戰俘為核心之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根基。

德國二戰受害苦難記憶如此普遍，甚可見諸主張正視猶太人大屠殺罪責的社會民主黨論述。1947 年，社會民主黨領袖舒馬赫(Kurt Schumacher, 1895-1952)即曾宣稱：「社會民主黨堅信戰俘不是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承擔者，而是受害者。」⁶⁵甚且，在強調德國戰俘困境時，社會民主黨人常連結自身納粹

⁶¹ 德國戰俘問題在西德國內與國際政治的高度能見性，引發更廣泛德國大眾對戰俘釋放的期待。不論民間或在野黨，聲聲催促艾德諾政府與蘇聯進行協商解決戰俘問題。然而，與蘇聯進行協商，跟艾德諾積極將西德政治、經濟與軍事重整至西方同盟體系的外交政策，實有抵觸。另一方面，在史達林於 1953 年逝世之後，蘇聯官方調整大規模強迫勞役政策並進行特赦，讓 10,197 名德國戰俘得以在 1953 年 6 月完全獲釋。1955 年，蘇聯調整外交政策，希望藉由與西德重建外交關係，達成保持歐洲現狀之目的，是故積極邀請艾德諾訪問蘇聯。綜合上述，在冷戰局勢之下，1955 年 9 月，艾德諾在 82% 德國大眾的期待下訪問莫斯科，最終得以在 1955 年 10 月至 1956 年 1 月將滯留蘇聯的最後一批 7,250 名德國戰俘「回家」。相關討論可參閱：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203-204, 206.

⁶²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206.

⁶³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53-56.

⁶⁴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56-58.

⁶⁵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57.

集中營經驗與德國戰俘的蘇聯集中營苦難，以建構共享的集體記憶。此外，社會民主黨也積極參與解救、救濟戰俘與相關資訊之搜集，並期待在選舉中囊獲戰俘的選票。⁶⁶

綜上所述，天主教、福音教會與不同黨派不分立場齊聲強調德國戰俘受難經驗，正顯示在艾德諾政府執政之前，德國集體受害論述已蔚然成風，同時也成為戰後西德重構集體認同的基礎。是故，搶救戰俘議題雖是艾德諾政府不可承受之重，但也成為其「由上而下」利用「由下而上」的德國人集體二戰受害苦難記憶的經驗基礎。

四、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

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形塑，有其內部政治以及冷戰國際政治脈絡因素，也有德國大眾二戰苦難經驗形塑之集體受害情結與記憶因素，且進而形諸同時期史學論著、歷史教科書、口述訪談紀錄、影視文藝、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等形式的官方與大眾文化記憶媒介之中。

(一) 史學論著與歷史教科書：猶太人大屠殺之常態化、合理化與相對化

艾德諾時期的西德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也明顯呈現在學術研究趨勢上。期間，西德學者相對忽略猶太人大屠殺議題，尤其 1950 年代，僅出現少數如邁乃克(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和瑞特(Gerhard Georg Bernhard Ritter, 1888-1967)等史家，⁶⁷以及其他心理學與政治學領域學者的論著，另有國際奧許維茲委員會秘書朗拜與猶太醫生阿德貝爾格(Lucie Adelsberger, 1895-

⁶⁶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58-59.

⁶⁷ Friedrich Meinecke,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 and Recollection*, trans. Sidney Bradshaw Fa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Friedrich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Eberhard Brackhaus Verlag, 1946); Gerhard Ritter, *The German Resistance: Carl Goerde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trans. R.T. Clark (London: Praeger, 1958).

1971)等少數奧許維茲集中營倖存者的回憶錄或證詞，相關學術研究相對缺乏，即使論及納粹德國與二戰，對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況之著墨則較少。⁶⁸這些研究論著與回憶錄，都值得進一步探究，以窺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論述如何呈現於各種文化記憶媒介，本文則聚焦檢視同時期西德史學整體趨勢，並以邁乃克與瑞特的論著為例切入討論。

首先，西德史家為了證明德國及其歷史的正常性，經常「改道」從事德國國族發展史、第二帝國史或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等納粹德國「前史」研究，而少數觸及納粹德國研究者，也習於將其探究主題置於歐洲史或世界史宏觀脈絡下詮釋，企圖相對化或淡化德國戰罪問題，以證明德國及其歷史發展的常態性。⁶⁹在此研究取向下，猶太人無緣透過史家發出自己的聲音，但少數經歷納粹德國與二戰的老生代與中生代史家，則嘗試將德國史從納粹德國的「災難」中解救出來，證明德國自 1871 年以來的合法性，⁷⁰其中以邁乃克與瑞特為主要代表。⁷¹對他們而言，納粹德國的「災難」意味德國的軍事挫敗、獨立國格之喪失、國體之分裂、領土之失落，但不包括猶太人大屠殺在內，呼應西德官方邊緣化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趨勢。

⁶⁸ 例如：Lucie Adelsberger, *Auschwitz: a Doctor's Story*, trans. Susan H. Ra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1995, c1956); H. G. Adler, Hermann Langbein, and Ella Lingens-Reiner, eds. *Auschwitz: Zeugnisse und Berich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1963); Eugen Kog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trans. Heinz Nord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0, c1946); Ota Kraus and Erich Kulka, *Die Todesfabrik* (Berlin: Kongress, 1957); Karl Dietrich Bracher,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rans. Jan Steinberg (New York: Praeger, 1970, c1969);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Dial Press, 1947); 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The Inability to Mourn: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Wolfgang Scheffler,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1935-1945* (Berlin: Colloquium, 1960).

⁶⁹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in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68.

⁷⁰ Stefan Berger,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00*, esp. 21-55.

⁷¹ Saul Friedländer, *Memory, History,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of Europe*, 1-21, 22-41.

在《德意志的災難：反思與追憶》(*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 und Erinnerungen*, 1946)一書中，邁乃克為德國及其文明辯護，哀嘆希特勒與納粹所致德國災難，試圖論證猶太人大屠殺的歐洲文明根源，並彰顯反納粹抗爭英雄事蹟。⁷²此外，為證明德國國族的正常性，邁乃克一方面論證德國對西方文化與價值的貢獻，主張納粹與希特勒實為德國歷史發展異象，但另一方面稱此一異象乃源於西歐啟蒙思潮以來的科技發展、群眾政治與工商慾望，並強調希特勒個人因素及其對德國精神的「不倫不類化」(Entartung)。⁷³由於《德意志的災難》意在探討德國災難及其成因，故強調德國人的受害者身分與苦難經驗，鮮少述及納粹集中營不義之行。正如史家達維多薇琪(Lucy Dawidowicz, 1915-1990)的觀察：「閱讀這本書的讀者，不會從中得知諸如奴工、集中營、大規模射殺、死亡工廠與屠殺六百萬猶太人之情事」。⁷⁴

中生代史家瑞特的相關歷史書寫，也呈現同樣特色。瑞特曾投身反希特勒抗爭運動，並在1944年7月20日刺殺希特勒行動失敗之後被捕入獄，直到1945年4月才由盟軍釋放。在《葛德勒與德意志反抗運動》(*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1954)一書中，瑞特主張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源於法國大革命，因群眾民主政治乃其興起的體制性因素，甚而認為希特勒並非極權主義獨裁者第一人，只是拿破崙的後繼者。此外，瑞特一方面稱納粹主義實源於奧地利以及將之施行於德國的希特勒，反猶情結僅出現在對經濟狀況感到不滿的少數中產階級與農民，並未普行於絕大部分德國人之間，另一方面對德國反猶主義與猶太人種族滅絕輕描淡寫。最後，瑞特試圖將納粹興起與二戰爆發歸因於歐洲「綏靖」氛圍，藉以淡化德國的集體戰罪。⁷⁵

⁷²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9.

⁷³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23; 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頁83-84。

⁷⁴ Lucy Dawidowicz,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58-59.

⁷⁵ Gerhard Ritter, *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54); Gerhard Ritter, *The German Resistance: Carl Goerde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23-24, 29-30.

更要者，在瑞特對反希特勒運動的討論中，推翻或刺殺希特勒的英雄論述才是核心議題，而這也是艾德諾時期官方論述的特色之一。在上述著作中，瑞特探析反希特勒運動要角葛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 1884-1945)，⁷⁶但對六百萬猶太人大屠殺保持沈默，僅提及曾有一百萬猶太人成為納粹政權受害者。⁷⁷

戰後二十年間的西德史家選擇性忽略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研究，或有學術體制因素。1950年9月，西德成立「現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專研國家社會主義與第三帝國史，其成員即包括邁乃克與瑞特。自1953年起，該所出版《現代史季刊》(*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刊載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研究，但該季刊大多論著均傾向從宏觀歐洲脈絡的比較視角解釋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大屠殺，藉以相對化或淡化德國戰爭罪責。⁷⁸

此外，戰後二十年間的西德史家選擇性忽略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研究，也源於新世代史家面對父執輩史家之納粹德國生命經驗的現實考量。戰後成長的新世代史家，在心理上仍未準備好面對老師與父執輩曾經歷或參與納粹德國政治與戰爭的經驗，只好迴避轉而研究德意志帝國與俾斯麥等納粹德國的「前史」。或者，新世代史家的師輩確實涉入納粹德國政治？針對此，

⁷⁶ 葛爾德勒原與納粹合作，但後來洞悉國家社會主義的罪惡本質，並在希特勒取得政權之後，拒絕將象徵納粹的卐字形懸掛在萊比錫市政廳上，且反而保護猶太商店免於納粹武裝黨衛隊的掠奪，甚至為了抗議納粹拆除猶太人作曲家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Bartholdy, 1809-1847)紀念碑，辭去萊比錫市長一職，並抨擊希特勒假造許多所謂德國史上的偉大傳統、玷污了德國國名、殘暴對待波蘭人與滅絕猶太人計劃。最終，葛爾德勒因刺殺希特勒失敗，於1945年2月2日面臨死刑厄運。相關詳細討論可參閱：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31-32。

⁷⁷ 同樣的，羅特費爾斯(Hans Rothfels, 1891-1976)在1951年出版的《德國對希特勒的反抗》(*Die deutsche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eine Würdigung*, 1951)一書中，也提出類似瑞特的論點。羅特費爾斯認為納粹政權並非純然德國現象，而是歐洲十九世紀世俗化運動的產物。藉此歷史解釋，羅特費爾斯將反猶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置於宏觀歐洲脈絡理解，藉以合理化德國納粹政權之興起，並相對化其戰罪。更要者，他僅以簡短篇幅處理德國納粹與反猶主義間的因果關係，而關於猶太人大屠殺部分也只涉及1938年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事件。換言之，雖羅特費爾斯觸及猶太人大屠殺，但也未述及猶太人種族滅絕具體情事。相關詳細討論可參閱：Hans Rothfels,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 An Assessment*, trans. Lawrence Wilson (London: Wolff, 1961), 31-33; Hans Rothfels, *Die deutsche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eine Würdigung* (Krefeld: Scherpe-Verlag, 1951).

⁷⁸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29.

羅倫茲(Chris Lorenz)將納粹德國時期的史家分成三類：第一種公開與納粹合作的史家，如積極從事反猶研究的法蘭克(Walter Frank, 1905-1945)，而此種僅佔少數；第二種是公開抵制納粹而流亡國外的史家；第三種是既未公開抵制納粹政權，但也未公開與納粹合作的史家，此種佔絕大部分。⁷⁹其中第三種史家，介於完全合作與完全抵制之間，努力適應納粹政權，並同時與納粹意識形態保持距離，以維持自身心靈自主，布羅斯剎(Martin Broszat, 1926-1989)將此心態稱為「免疫」(Resistenz)，但這類史家在戰後西德逐漸成為史學界要角，佔有主宰性地位，直到 1970 年代，⁸⁰例如曾在 1962 到 1977 年間先後擔任德國歷史學家學會主席的厄德曼(Karl Dieter Erdmann, 1910-1990)、席德(Theodor Schieder, 1908-1984)與孔澤(Werner Conze, 1910-1986)。

跟許多戰後二十年間的德國人一樣，厄德曼、席德與孔澤習於選擇性遺忘在納粹德國時期的生命經歷，或者保持沈默。曾在 1962 年至 1967 年間擔任德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厄德曼，宣稱自己從未與納粹有任何牽連，也並非於納粹德國時期展開其史家生涯，以此證明他與納粹之間的距離。然而，根據克羅格(Martin Kröger, 1960-)與提姆(Roland Thimme, 1931-2014)對厄德曼書信與著作的考察，厄德曼在納粹時代確曾書寫血統、種族、土壤與祖國等相關主題論著，且與納粹政策具親近性。⁸¹厄德曼選擇性遺忘納粹時期生命經歷的作法，是戰後許多德國人面對納粹過去的一種記憶取向。例如，其他史家如席德與孔澤，都曾為納粹黨員，其中席德甚至以其東歐族群與人口學專業，長期擔任納粹政權顧問，尤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間，曾建議納粹政權解決東歐人口過多的問題，並主張透過重新安置或移出波蘭人，將波蘭「再德意志化」。⁸²由此可見，曾與納粹合作而在戰後又在西德延續歷史學術生涯的學者，自然很難積極面對其納粹德國時期的生命史，故而沈默或遺忘以對。

⁷⁹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2.

⁸⁰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3.

⁸¹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5.

⁸²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4.

是故，部分戰後德國新世代史家選擇為厄德曼、席德與孔澤等師輩辯護或合理化，認為他們受質疑與批判的著作，都具納粹德國時期時代性，或聲稱他們的著作都曾遭出版商改寫，難以釐清與判定個人責任。⁸³ 不論如何，厄德曼、席德與孔澤等史家選擇性遺忘其與納粹的關係，說明這些在戰後西德史學界仍扮演要角的史家，何以直到 1970 年代，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都未成為其研究主題。⁸⁴

除了史著之外，艾德諾時期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也呈現在歷史教科書對德國二戰集體苦難的強調。艾德諾政府將中東歐德裔難民的生命經驗編入教科書，並成立學術機構推動東歐史研究。⁸⁵ 尤其，期間西德歷史教科書的二戰書寫，特別突出空襲與戰俘等德國二戰苦難，而猶太人大屠殺卻宛如未曾發生。例如，教科書鉅細彌遺的描述德國士兵在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的受難經驗。此外，當教科書提及戰爭罪責，則完全歸咎於納粹與希特勒，甚而檢討希特勒在戰術與政治上的缺失，但僅以 47 字內文輕描淡寫猶太人大屠殺，並多以「最後解決方案」與「猶太問題」等名詞隱晦指稱，缺少具體情況之描述。甚者，教科書常出現紐倫堡大審美國法官的證詞，指出「不超過

⁸³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66; 然而，雖戰後德國新世代歷史學家傾向為納粹世代師輩學者辯護或合理化，但並非全部如此。例如，根據 Christoph Nonn 出版的席德傳記，席德的學生與兒子沃爾夫岡·席德(Wolfgang Schieder)即嘗試促使席德揭露自己在納粹德國時期所扮演的角色。相關內容可參閱：Christoph Nonn, *Theodor Schieder. Ein bürgerlicher Historiker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Droste, 2013), 222. 此處補述觀點與相關資料為本文匿名審查者提供，特此說明與致謝。

⁸⁴ 另外，根據 Alf Lüdtke (1943-2019)，戰後西德史家之所以未能將猶太人大屠殺的具體情事列為歷史研究主題，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 1940 至 1950 年代的生還者證詞過於情緒化、時間距離過近或不客觀。但是有趣的是，當他們研究德國人在戰爭期間所遭遇的被迫遷徙災難時，卻不會認為《被驅離的中東歐德意志人文獻集》中的內容不夠客觀。參閱：Alf Lüdtke,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Illusions of Remembering, Ways of Forgetting Nazism in West German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5 (1993): 550.

⁸⁵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20-1023.

一百人」知道「最後解決方案」，儼然德國人集體無知論述的司法根據。⁸⁶換言之，戰後二十年間西德歷史教科書側重描寫德國二戰苦難經驗，反映德國集體受害論述之主宰性，以及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罪責歸因於納粹與希特勒、德國人集體無知等論述。

綜上所述，戰後西德二十年間的德國納粹災難歷史解釋，以及歷史教科書的二戰書寫，清楚呈現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主旋律：迴避並邊緣化猶太人大屠殺議題、戰罪責任歸於納粹與希特勒、德國軍民的二戰受害苦難者身分、德國人對大屠殺的集體無知、反抗納粹英雄論述，以及德國歷史解釋的相對化與常態化傾向。

(二)口述歷史與影視文藝

艾德諾政府成立「聯邦流離失所者、難民與戰爭傷害部」，除了照顧中東歐德裔難民與戰俘社群的身心療癒與福利之外，也積極採集他們的二戰苦難創傷記憶，以為凝聚西德政治認同的基礎。首先，在羅特費爾斯、席德、孔澤、布羅斯剎與惠勒(Hans-Ulrich Wehler, 1931-2014)等德國史家團隊的努力下，自 1950 年陸續出版八大冊《被驅離的中東歐德意志人文獻集》(*Dokumentation der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Ost-Mitteleuropa*)，其中包括一萬一千名受訪者訪談紀錄與三部日記。其次，艾德諾政府積極推動戰俘口述證詞之採集與整理，規劃出版 22 冊彙編，內含四萬五千份書面與錄音紀錄。⁸⁷

有關中東歐德裔難民與德國二戰戰俘的苦難經驗，不但是西德官推口述歷史的主要內容，也成為戰後至 1960 年代大眾影視文藝創作的主题。例如，1951 至 1959 年間，總計一千九百萬人次觀賞了以洛恩斯(Hermann Löns, 1866-

⁸⁶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 no.1 (2003): 50-52.

⁸⁷ 但由於完成編輯時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不再重視戰俘苦難記憶之建構，直到 1974 年才順利出版。此或因社會民主黨於 1969 年贏得國會大選後與自由民主黨合組執政聯盟，並由布蘭特擔任總理以來，對外採取「新東向政策」(Neue Ostpolitik)外交路線，期與東歐與蘇聯建立良好關係，故使紀錄蘇聯戰俘受難經驗的口述彙編因缺乏政治正確性而遲遲無法出版。相關討論可參閱：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23-1025.

1914)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荒野綠了》(*Grün ist die Heide*, 1951)，該電影即描述一位地主戰後由中東歐遷徙至西德的故事，立意刻畫中東歐德裔難民成功融入西德社會的歷程，正符合艾德諾時代官方論述基調；⁸⁸德國劇作家博爾歇特(Wolfgang Borchert, 1921-1947)的劇作《外面的人》(*Draussen vor der Tür*, 1947)，以歸來戰俘為主角，再現德國戰俘的苦難遭遇，以及他們回歸後在西德社會中的疏離狀態；⁸⁹德國戰後初期的「礫石電影」(movies of rubble)藉由描繪戰俘的返鄉之路，讓德國集體受害意象得以廣泛流傳，尤其是李本埃納(Wolfgang Liebeneiner, 1905-1987)改編自《外面的人》的電影《愛在四七年》(*Liebe 47*, 1949)。⁹⁰這些德國戰後二十年間的大眾影視文藝作品，都是檢視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重要研究材料，值得進一步再探。

(三)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

艾德諾政府也時時利用各種途徑形塑德國大眾的戰俘苦難記憶，如戰後初期每年舉行戰俘紀念日儀式。尤其，1950年代戰俘紀念日儀式活動，具體呈現以戰俘為核心的德國集體受害論述。例如，西德官方每年定期舉辦記憶週或忠誠日活動，提醒大眾仍有大量德國戰俘受困蘇聯集中營；德國聯邦議會在記憶週，擇日進行工作與交通暫停兩分鐘的活動；各地官民舉行火把遊行、靜默遊行、樹立「記憶蠟燭」等紀念戰俘活動；在教會的祈禱週儀式基礎上，官方、教會與民間戰俘組織共同發展出紀念戰俘儀式，揭發全國一體釋放戰俘的訴求；民間戰俘組織在全國各地發放傳單與海報、四處連署、在各地社區設置釋放戰俘標語等。⁹¹

⁸⁸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031.

⁸⁹ Wolfgang Borchert, *The Man Outside*, trans. David Porter (New York: New Direction, 1971).

⁹⁰ Robert G. Moeller,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25.

⁹¹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186-188.

此番眾多官民紀念戰俘的儀式活動，具濃厚象徵與政治意涵。就象徵意涵言，各種宗教與政治社群不分立場共推並參與戰俘紀念活動的共識，正象徵戰後西德的團結與一體性，同時也消解了戰爭受害者、旁觀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線。就政治意涵言，各宗教與政治社群利用紀念活動合理化各自主張，如利用釋放戰俘及相關紀念活動合理化特赦戰犯的訴求，或將戰犯重新定義為遣返戰俘，其中甚至包括涉及猶太人大屠殺的國防軍高階軍官與納粹份子，以便將他們重整到西德社會。⁹²更要者，這些具象徵與政治意涵的儀式活動，得以經身體實踐方式形塑德國大眾的二戰受害苦難記憶。

猶太人大屠殺記憶之邊緣化，也反映在「國殤日」(Volkstrauertag)的設立。在西德建立之後，聯邦政府與各地議會代表提議廢除盟軍設立的「法西斯受難者紀念日」，並主張於 11 月與陣亡將士受難者一起紀念。是故，1952 年 11 月，西德設立「國殤日」，在每年第一個降臨節前的第二個週日，共同追悼戰爭期間罹難的平民與軍人，以及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受難者。學者認為，之所以如此，主因有三：一、西德一直缺少一個紀念二戰陣亡將士的紀念碑；二、猶太人受難者在盟軍佔領期之後逐漸失去重要性，故強調對二戰受難德國軍民的悼念，淡化猶太人大屠殺受難者的地位；三、冷戰國際政治因素。⁹³關於「國殤日」之設立與相關紀念與儀式活動，也是檢視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形諸文化記憶媒介的重要視角，值得進一步探究。

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以戰爭受害者為核心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也反映在大眾媒體報導內容。根據庫恩爾(Reinhard Kühnl, 1936-2014)的研究，1963-1964 年西德 53 家報紙對納粹掌權 30 週年與刺殺希特勒事件的評論，通常將二戰爆發原因及其災難性結果，完全歸因於希特勒的「惡魔本質」及其導致的「激烈的(納粹)社會流行病」之上，並聲稱雖希特勒發動了許多卓越的戰役，但卻錯估戰爭結果。更要者，報紙傳媒在討論戰爭結果時，通常只

⁹² Frank Biess,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191-193.

⁹³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38.

強調德國城市因空襲受到的破壞、從中東歐被迫驅離的德國裔難民與德國戰俘遭受非人道暴行等，完全不提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⁹⁴

戰後西德右翼人士的戰爭回憶錄，也試圖常態化或相對化納粹暴行，並強調德國集體二戰受害苦難。這些回憶錄主切割與納粹、蓋世太保、黨衛隊的關係，並稱集中營乃英國人的發明，且德國集中營並未像批評者所稱那般惡劣，甚而低估猶太人大屠殺的規模，最後還批判戰後紐倫堡大審等戰犯審判缺乏合法性。為淡化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罪惡，回憶錄主習於將大屠殺與西方盟國的戰罪進行比較，例如戰後法國、捷克、義大利屠殺叛國者，以及荷蘭集中營與蘇聯的卡廷(Katyn)波蘭人大屠殺等，甚至主張歐洲歷史上已出現諸如獵巫、宗教戰爭、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大屠殺，藉以說明猶太人大屠殺既非史無前例，殘暴程度也非至極。如此相對化論述，企圖彰顯不論是德國，亦或是西方盟國，都曾在歷史上與二戰期間犯下類似暴行。最要者，這些具國族主義情緒的回憶錄，在在強調盟軍對德國城市無情的空襲轟炸，以及戰後 1,200 萬中東歐德裔難民與 300 萬德國戰俘的二戰受害苦難。⁹⁵此一相對化猶太人大屠殺與突出德國人二戰受害者身分的論調，也將再次見諸 1980 年代基督教民主聯盟柯爾執政時期的「史學家論戰」(Historikerstreit)之中。⁹⁶

五、對抗性的猶太人大屠殺另類記憶文化

綜合上述，《沈默迷宮》在虛實交織的情節中，生動體現艾德諾時期官方與大眾以迴避與沈默態度面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以及轉而選擇性記憶德國二戰集體受害苦難記憶的趨勢，可謂德國戰後 1950 至 1970 年代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卻也從而以萊德曼與鮑爾等角色之演繹展現迥異於官方的對抗性另類記憶文化。但是，如此官方主流記憶文化與

⁹⁴ Reinhard Kühnl, *Das Dritte Reich in der Presse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63, 115.

⁹⁵ Alfred D. Low,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80-81.

⁹⁶ 相關討論可參閱：Peter Baldwin, ed., *Reworking the Past: Hitler,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0); Charles S. Maier, *The Unmasterable Past: History, Holocau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對抗性另類記憶文化同時共存的現象又如何理解與詮釋呢？雖然一方面以迴避與沈默態度面對猶太人大屠殺，另一方面轉而強調德國集體二戰受害苦難經驗，是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主流的一體兩面，但它卻並非戰後二十年間西德的唯一聲音，而主張正視與省思猶太人大屠殺罪責的另類記憶文化，也以公共評論、政治論述與文藝創作等各種形式對抗官方記憶文化，惟其在公共領域的聲量相對微弱。而且，此般猶太人大屠殺的另類記憶文化，不但影響 1970 年代社會民主黨時期相關記憶文化，更有來自艾德諾時期的淵源。

(一) 社會民主黨的政治論述傳統

在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下，西德並非完全沒有強調正視與反思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罪責的「異聲」。首先，盟軍佔領時期的「再教育政策」、「去納粹化」運動與紐倫堡大審，向西德大眾披露諸多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實情，雖未佔據當時西德公共論述核心，也未為德國大眾接受。其次，德國二戰前即存在反納粹政治傳統，戰爭結束後於盟軍佔領時期再次出現於西德公共領域論述之中。許多倖存的溫和保守主義、自由左派與社會民主黨人士，重回西德政治領域扮演要角，也提出正視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論述，且儼然主流，但一到 1950 與 1960 年代的艾德諾時期，則一時隱沒而潛伏。例如，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德國的罪責問題》(*Die Schuldfrage*, 1946)中討論「刑法罪責」(*kriminelle Schuld*)、「政治罪責」(*politische Schuld*)、「道德罪責」(*moralische Schuld*)與「形上罪責」(*metaphysische Schuld*)等四種罪責概念，即意在呼籲大眾不要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罪責，應勇於承擔各種罪責。⁹⁷在政治領域，社會民主黨主席舒馬赫與擔任首任西德總統的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主席霍伊斯(Theodor Heuss, 1884-1963)，也積極主張正視納粹德國的罪責。

⁹⁷ Jeffrey K. Olick, "What Does It Mean to Normalize the Past? Official Memory in German Politics since 1989,"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2, no.4 (1998): 556.

作為艾德諾時期反對黨政治領袖，1946 至 1952 年間任社民黨主席的舒馬赫，在戰後初期不斷提醒德國人民應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過往，主張賠償大屠殺倖存者，並與以色列發展正常關係之外，也極力主張「去納粹化」與持續審判戰犯，以肅清戰後德國政府中的納粹份子。舒馬赫的論述基調，在 1950 年代繼續由諸如羅伊特(Ernst Reuter, 1889-1953)與阿恩特(Adolf Arndt, 1904-1974)等社會民主黨人士承繼，但並不足以挑戰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與德國人的二戰受害苦難心態。⁹⁸

此外，西德首任總統霍伊斯，將德國聯邦總統(Bundespräsident)一職視為德國良心與歷史記憶的捍衛者，在其擔任總統期間(1949-1959)於許多公開演說不遺餘力提醒德國社會切記納粹戰罪及其受害者。例如，1949 年 12 月，霍伊斯即曾強調，「我們必不能忘記紐倫堡法、黃色臂章、猶太人會堂毀壞、猶太人被驅逐出國以及他們的災難與死亡。」⁹⁹1952 年 11 月 30 日，在盟軍佔領時期即已規劃興建的貝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紀念碑¹⁰⁰的揭幕儀式上，霍伊斯發表以〈對死亡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Tod”)為題的演講，¹⁰¹其中聲明「德國人想要、應該、而且必須學習勇敢地面對真相」，而「所有德國人」都必須「承認由德國人所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該「嘗試粉飾、常態化、甚或合理化這些罪行」，並強調「我們確實知道這些罪行」，且「必不能忘德國人在可恥的年代裡所做過的事」。¹⁰²類此論述，乃霍伊斯推動「對

⁹⁸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16.

⁹⁹ Gilad Margalit,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37.

¹⁰⁰ 根據紀念碑官方網站，1946 年夏天一個包括集中營倖存者代表在內的國際委員會提議興建此一紀念碑，雖於 1952 年 11 月順利揭幕，但於 1950 年代逐漸被世人所遺忘。參閱：“A Place of Remembrance,” *Gedenkstätte Bergen-Belsen*, <https://bergen-belsen.stiftung-ng.de/en/history/placeofremembrance/>，擷取日期：2023 年 10 月 21 日。

¹⁰¹ Theodor Heuss, “Heuss weicht Mahnmal in Belsen ein: Der Bundespräsident gedenkt der Opfer des ehemaligen KZ,” *Frankfurter Rundschau* (Frankfurt), December 1 1952, 1; 關於此一演講之討論，參閱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頁 62、91。

¹⁰² Theodor Heuss, “Speech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Memorial for the Victims of Bergen-Belsen, November 1952,” in Roderick Stackelberg and Sally Winkle, ed.,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An Anthology of Tex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401-402.

抗遺忘運動」(Feldzüge gegen das Vergessen)¹⁰³的一部份，雖在 1950 至 1960 年代隱沒於艾德諾政府的主宰性論述之下，但也為 1960 末至 1970 年代西德猶太人大屠殺再度成為公共領域討論主題奠定了基礎。因此，舒馬赫與霍伊斯均為戰後德國左派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在各時期得以再浮現的奠基者，並由魏茲澤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 1920-2015)於 1980 年代發揚，且隨德國內部政治與國際冷戰政治變遷，時而隱沒，時而浮現，時而另類，時而主流。¹⁰⁴

(二) 打開潘朵拉的盒子：阿多諾的提議與費雪爭議

1959 年，在法蘭克福檢察廳年輕檢察官展開奧許維茲集中營調查之際，阿多諾(Theodor Adorno, 1903-1969)批評西德艾德諾時期以迴避與沈默態度面對猶太人大屠殺。在〈何謂清理過去？〉(“Was bedeutet: 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 1959) 一文中，阿多諾區分兩種難以面對之過去的模式，一種需不斷自我批判、反省的「清理過去」(Aufarbeitung der Vergangenheit)，另一種則是迴避過去而保持沈默的「支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阿多諾認為，1950 年代的西德便是以「無意識或非無意識」的迴避和沈默態度處理猶太人大屠殺，而非真正積極面對與反省。¹⁰⁵

其次，在 1960 年代初，西德史學界吹起一陣間接面對猶太人大屠殺的短暫風潮。1961 年，德國史家費雪(Fritz Fischer, 1908-1999)出版《追求世界霸權：德意志帝國的戰爭策略，1914-1918》(*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一書，討論德意志帝國發動一戰的主因，引發史學界的「費雪爭議」。¹⁰⁶一部以德意志帝國與一戰為主題的論著，為何引起爭議呢？其主因在於費雪的論點影射德意志帝國和納

¹⁰³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頁 62。

¹⁰⁴ Jeffrey Her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16-17.

¹⁰⁵ Theodor Adorno, “What do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Mean?,” in Geoffrey Hartman, ed., *Bitburg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4-129.

¹⁰⁶ 關於「費雪爭議」的詳細討論，可參閱：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頁 241-245。

粹德國在發動戰爭目的上的相似性。¹⁰⁷費雪主張德國發動一戰的動機，實延續自帝國時期的「九月政綱」(Septemberprogramm)，而「九月政綱」乃源於德意志帝國政治領袖面對十九世紀末國內社會結構改變所致政治壓力，因而企圖以成為世界霸權的作法來滿足德國社會內部需求。甚者，費雪將德意志帝國對世界霸權的追求與納粹德國連結在一起，影射兩者之間的歷史連續性，故引發瑞特與希爾格魯伯(Andreas Hillgruber, 1925-1989)等史家對他的批評。¹⁰⁸

1969年，費雪出版《虛幻之戰》(*Krieg der Illusionen*)，¹⁰⁹從社會學與經濟學視角分析一戰前德意志帝國諸如易北河以東的傳統大地主、重工業財團、土地貴族出身之軍官階級和文官階層等政經菁英集團之利益需求，以及帝國東向擴張拓展「生存空間」政策之間的關係，並指稱其為德國反猶傳統根源。換言之，費雪一反邁乃克與瑞特常態化德國歷史發展並將納粹與希特勒視為異象的論點，而認為其來有自，並非德國歷史發展的「意外脫軌」。¹¹⁰

「費雪爭議」的意義在於，它一方面呈現戰後西德史家大部分「改道」而著力於德意志帝國歷史，以迴避探究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事的趨勢，但另一方面卻也迥異於艾德諾時期官方將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完全歸因於希特勒與納粹及其所致「意外脫軌」的基調。

(三)伯爾與葛拉斯的小說創作

艾德諾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另類記憶文化也呈現於小說與戲劇等文藝作品，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爾(Heinrich Böll, 1917-1985)與葛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 1927-2015)等德國著名小說家的創作。

伯爾因其六年國防軍經驗，終生思索二戰議題，不斷檢視德國戰罪與受難經驗的意義，並以文學再現納粹在戰後德國社會的影響。伯爾深信對納粹

¹⁰⁷ Chris Lorenz,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72.

¹⁰⁸ 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頁 241-242。

¹⁰⁹ Fritz Fischer,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1914* (Düsseldorf: Droste, 1969); Fritz Fischer,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trans. Marian Jackson (New York: Norton, 1975).

¹¹⁰ 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頁 85。

過往沈默以對，有害戰後德國社會及其年輕世代。因此，伯爾終生致力於以文藝創作形式保存戰爭記憶，並反思納粹罪責。

伯爾的創作主題與觀點，明顯與艾德諾時期的西德主流記憶文化大相徑庭。因此，伯爾經常感嘆難以尋找出版創作的渠道，在一封 1950 年 11 月給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即曾經說道：「很明顯，戰爭及其各種效應，是我真正的主題，但沒有……想要閱讀或耳聞任何有關戰爭的事情。」¹¹¹是故，伯爾許多早年創作，直到 1980 年代、甚至晚近才出版。例如，伯爾創作於 1948 年的《一個士兵的遺產》(*Das Vermächtnis*)出版於 1987 年，而創作於 1947 年的《無愛之交》(*Kreuz ohne Liebe*)，則遲至 2002 年才出版，因為它們對德國戰爭罪責與一般德國戰爭受害經驗的反思之批判性過於激烈。¹¹²

在其作品中，伯爾經常將德國士兵或小人物描繪成戰爭受害者與納粹罪行共犯，藉以反思納粹德國與猶太人大屠殺罪責。¹¹³例如，伯爾透過《準點火車》(*Der Zug war pünktlich*)探究一般士兵對於希特勒的瘋狂信仰，意在表現一般小人物如何成為納粹戰罪共犯，¹¹⁴反思旁觀者不作為的共犯責任。在創作於 1947 年而出版於 1983 年的《死因：鷹鉤鼻》(*Todesursache: Hakennase*)中，伯爾以更直白的方式描繪了猶太人大屠殺。例如，在一段情節中，猶太人 Grimschenko 即將被德國士兵槍殺，其妻向 Hegemüller 中尉求情，但當中尉找到 Grimschenko 時，後者已死，中尉因而「感到他(自己)不再無辜，知道他(自

¹¹¹ 轉引自：Elisabeth Krimm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r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116.

¹¹² Frank Finlay, “‘Ein Schriftsteller, der funktioniert, ist keiner mehr’: Heinrich Böll and the Gruppe 47,” in K. Stuart Parkes and John J. White, eds., *The Gruppe 47 Fifty Years on: A Re-appraisal of Its Literary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tlanta: Rodopi V. K., 1999), 106.

¹¹³ 在《準點火車》(*Der Zug war pünktlich*)中，伯爾指出「戰爭如此恐怖，以至於所有事情都毫無意義，每個人只是到處謀殺無辜的人……」，戰爭中「只有受害者和加害者心腹」。轉引自：Frank Finlay, “‘Ein Schriftsteller, der funktioniert, ist keiner mehr’: Heinrich Böll and the Gruppe 47,” 122.

¹¹⁴ 同樣的內容也出現在《士兵的遺產》，伯爾不但藉此譴責納粹暴行，還提醒讀者注意旁觀者不作為的共犯性。轉引自：Frank Finlay, “‘Ein Schriftsteller, der funktioniert, ist keiner mehr’: Heinrich Böll and the Gruppe 47,” 123.

己)被迫進入罪惡核心。」¹¹⁵如此，一個德國軍人不但成為猶太人加害者，同時也成為一個因己身罪行而滋生罪惡感的受害者。¹¹⁶在伯爾的創作之中，加害者時常也是自身罪行的受害者，也由於加害者與受害者絕然二分法並不永遠適用，更加彰顯戰爭的嚴肅性與複雜性。

更要者，伯爾也反思納粹戰罪對於戰後德國社會的負面影響。他認為納粹德國與戰後德國社會之間其實不可切割，更直言戰後德國經濟奇蹟之下的德國社會其實深陷恐懼、貪婪與被壓抑的罪惡感之中，直言：「太多謀殺者正在這個國家自由而無禮地到處活動，許多人的罪行永遠無法被證明，罪惡感、懺悔、與自我懲罰和洞識沒有成為社會的範疇，更不用說政治的範疇。」¹¹⁷正如在伯爾的《一個士兵的遺產》中，戰爭期間謀殺許多人的納粹軍官 *Schnecker*，在戰後仍然功成名就，猶如《沈默迷宮》劇情所再現。更要者，伯爾並沒將 *Schnecker* 描繪成一個殘暴野獸，而只是不知悔罪的一般人，藉以比喻作為猶太人大屠殺共犯或旁觀者的無名德國大眾。

相對於伯爾不斷游移在德國戰爭罪責的批判與一般德國二戰受害者苦難的同情之間，葛拉斯則專注於德國戰爭與大屠殺暴行罪惡的反思，故而因其「戲謔的黑色寓言描繪出被遺忘的歷史臉孔」與「被否認與被遺忘的過去」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¹¹⁸作為一個戰俘以及被迫從但澤自由市(*Free City of Danzig*)遷徙回西德的中東歐德裔難民，¹¹⁹葛拉斯堅信難民苦難與納粹戰罪密切相關，而其創作《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 1959)即在批判故事主角不斷

¹¹⁵ 轉引自：Frank Finlay, “‘Ein Schriftsteller, der funktioniert, ist keiner mehr’: Heinrich Böll and the Gruppe 47,” 126. 此處引文括號中的「自己」二字為本文作者所加，以利讀者精確掌握文意。

¹¹⁶ 同樣地，在《亞當你在哪裡》(*Wo warst du, Adam*)中，伯爾也以直白的方式再現猶太人大屠殺。在故事中，伯爾不斷述及集中營的煙囪，且提及大量猶太人受害者，並反思加害者與受害者二分法的適用性。轉引自：Frank Finlay, “‘Ein Schriftsteller, der funktioniert, ist keiner mehr’: Heinrich Böll and the Gruppe 47,” 127.

¹¹⁷ Mark Cory,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Violence in the Late Prose of Heinrich Böll,” *University of Dayton Review* 19, no.2 (1988): 49.

¹¹⁸ Swedish Academy,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9: Günter Grass,”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99/summary/>，擷取日期：2020年5月31日。

¹¹⁹ 葛拉斯的難民經驗，可參閱其回憶錄《剝洋蔥》：Günter Grass，魏育青等譯，《剝洋蔥》(臺北：時報出版，2009)，頁127、149、201-202、204-211。

自我彰顯為受害者的態度，並反思潛藏於受害論述的危險性，且與伯爾一樣，注意到受害者與加害者並非絕然二分。¹²⁰《鐵皮鼓》的敘事主角奧斯卡(Oskar)小時經常遭社區孩童霸凌，在青少年時期又被幫派份子迫害，作為一個侏儒，又是納粹政權優生學下的潛在受害者。不僅如此，奧斯卡也與其他納粹政權受害者關係密切，例如被迫害的猶太玩具商馬庫斯(Marcus)與被同學暴打的波蘭同學。然而，受害者奧斯卡同時也是協助納粹罪惡的加害者。尤其，奧斯卡的藍眼睛及其成為藝術家的想望，都讓人聯想到希特勒，而其打鼓活動更隱喻希特勒作為鼓吹納粹的身分。作為侏儒表演劇團成員，奧斯卡在歐洲各地慰勞德國士兵，更象徵他對於德國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涉入。

《鐵皮鼓》中的奧斯卡不僅是受害者與加害者，還是一位不作為的旁觀者。例如，在《鐵皮鼓》中，奧斯卡曾在大西洋壁壘日擊德國軍人以機關槍屠殺無辜修女的暴行，但卻從未採取任何行動阻止，反而「幾乎不說話」地繼續吃早餐，¹²¹而此一沈默正寓意德國人作為旁觀者的罪惡，正如葛拉斯所言：「任何人保持沈默，都引發罪惡」¹²²。《鐵皮鼓》中許多情節，在在說明作為成人的奧斯卡，時常隱身在其兒童外表下而不作為與逃避責任。換言之，奧斯卡同時是一名受害者、加害者與旁觀者。如此一來，奧斯卡的多重面向，正象徵德國大眾作為納粹戰罪共犯結構下的加害者、受害者與旁觀者身分，反面寓意對戰後西德集體沈默與逃避納粹罪責心態的批判。

在《鐵皮鼓》中，葛拉斯甚至藉由奧斯卡之口嘲諷艾德諾時期的主流記憶文化，稱戰後西德選擇性遺忘納粹戰罪而「變臉」的虛偽，直指「人們都換了一副面孔」，¹²³遺忘他們曾是納粹政權的支持者與崇拜者，忘卻他們曾是納粹暴行的共犯與旁觀者，到戰後反而成了反納粹主義者；此情此景，不禁讓人聯想到《沈默迷宮》中美軍軍官奚落萊德曼之語：「你們也曾是納粹」、「一但戰敗馬上變成好人」、「戰後人人都成了反抗鬥士」。

¹²⁰ Elisabeth Krimm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r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133-134.

¹²¹ Günter Grass, 胡其鼎譯，《鐵皮鼓》(臺北：桂冠，1993)，頁 437-439。

¹²² 轉引自：Elisabeth Krimm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r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136.

¹²³ Günter Grass, 《鐵皮鼓》，頁 54。

在《鐵皮鼓》之後，葛拉斯又於發生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大審的 1961 年與法蘭克福大審的 1963 年，出版了《貓與鼠》(*Katz und Maus*, 1961)與《狗年月》(*Hundejahre*, 1963)兩部小說，共同構成「但澤三部曲」(*Danziger Trilogie*)，且都以葛拉斯故鄉但澤自由市為中心，文學再現二戰前後德國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並透過各個主人翁的故事與情節，彰顯納粹德國崛起和國家社會主義時期黨國暴力及其集體心理基礎，也同時再現戰後中東歐德裔難民苦難，更寓意對艾德諾時期西德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控訴與批判。¹²⁴

然而，葛拉斯於 2006 年出版的回憶錄《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藉由其個人生命經驗的回溯，如「剝洋蔥」般經層層遺忘與記憶的抽絲剝繭，嘲諷並批判納粹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國家暴力、不義之行及其共犯結構，反思德國大眾於猶太人大屠殺歷程中與戰後呈現的集體冷漠與沈默態度，卻也同時揭露自己於十歲加入「德國少年團」(*Deutsches Jungvolk*)、十五歲加入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而成為空防助手(*Flakhelfer*)，甚而在十七歲於戰爭末期的 1944 年秋天成為納粹武裝黨衛隊裝甲師一員之種種經驗，並反思自我壓抑負罪感與相關生命記憶的心理歷程。¹²⁵如此，兩相對照葛拉斯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創作的「但澤三部曲」，以及他在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正值眾聲喧囂時期自曝武裝黨衛軍經驗，反而更加彰顯葛拉斯深受戰後德國相關官方記憶文化箝制而對其涉入納粹罪責經驗保持長年沈默的態度。不論是葛拉斯藉「但澤三部曲」批判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抑或其自身從自我壓抑到揭露納粹戰罪之心路歷程，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綜合上述，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強調以戰俘為核心的德國二戰受害苦難記憶，並對大屠殺抱持迴避與沈默的心態，且習於將納粹戰罪全歸因於希特勒與納粹黨政菁英，以合理化集體無知與無罪論述，而凡此種種也具體表現在官方對德國二戰受害苦難文化記憶之建構，並同時形諸前述各種大眾文化記憶媒介，而同樣趨勢更可溯及艾德諾時代之前

¹²⁴ Günter Grass, 蔡鴻君、石沿之譯，《貓與鼠》(臺北：貓頭鷹，2001)；Günter Grass, 刁承俊譯，《狗年月》(臺北：貓頭鷹，2001)。

¹²⁵ 相關內容參閱：Günter Grass, 《剝洋蔥》，頁 31-33、69、71、74、79-80、88、116-117。

立場各異之宗教與政治社群的公共論述與紀念儀式活動。但是，這並非意味戰後西德內部沒有異於官方記憶文化的聲音，正如社會民主黨的另類論述傳統、費雪的歷史論著，以及伯爾與葛拉斯的小說作品所反映。

六、結論

本文在解讀與詮釋電影《沈默迷宮》並提問的基礎上，首先探究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特徵及其形塑脈絡。基於重新融入西方國際政治體系的外交方針，以及重塑民主憲政而於穩定中重建國家的現實需求，再加上戰後以來即存在於德國大眾集體創傷心理的二戰受害苦難情結，艾德諾時期西德官方一方面「對外」嘗試與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並賠償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與以色列國家，另一方面「對內」以「畫下底線」政策迴避面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罪行，且沈默以對之外，同時轉而彰顯諸如盟軍空襲轟炸、中東歐德裔被迫遷徙難民與德國戰俘等二戰受害苦難以及反抗納粹英雄，更將罪責歸咎於希特勒與納粹黨政軍菁英少數，藉以合理化德國集體無知與無罪之心態。凡此諸般艾德諾時期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特徵，除了如《沈默迷宮》演繹那般展現在司法警政等公部門體系，也廣泛形諸歷史學術論著、歷史教科書、口述訪談紀錄、影視文藝、紀念儀式、大眾媒體與回憶錄等文化記憶媒介之中。

而且，由本文論證亦可見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與德國大眾強調二戰受害苦難情結之間互為交織的紋理。尤其，在艾德諾政府執政之前，戰後德國官民、教會與政黨不分宗派與立場紀念德國戰俘受害苦難之記憶文化已蔚然成形，但也成為艾德諾時期官方「由上而下」進一步形塑以德國戰俘二戰受害苦難集體記憶的基礎。

其次，在終戰七十週年前夕問世的《沈默迷宮》雖虛、實交織，但本文藉由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主流記憶文化形塑脈絡之探析，及其與電影情節之對話，可證電影作為大眾歷史表述形式，不但視覺化了西德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官方與大眾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與選擇性記憶德國二戰受害苦難的集體心理與歷史情境，也以法蘭克福檢察廳檢察官為原型的虛構角

色萊德曼為中心，發展以闡述法蘭克福大審前曲折偵調過程為主軸的情節，從中彰顯迥異於官方的對抗性另類記憶文化之逐漸浮現，而法蘭克福檢察廳總長鮑爾此一真實人物角色，僅於電影情節關鍵、轉折處穿插，以畫龍點睛的臺詞，體現艾德諾時期警政和司法等公部門，在「畫下底線」政策下邊緣化猶太人大屠殺歷史的趨勢，如此避免電影情節因鮑爾本身及其亦發揮關鍵作用的「艾希曼大審」所衍生的爭議性元素，而使以寓意法蘭克福大審前夕西德結構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之時代情境為核心的電影創作意旨不至於失焦。¹²⁶再者，在此敘事策略之下，《沈默迷宮》的情節內容，得以成為再現並乘載戰後西德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例如，電影中檢察官海勒以「戰勝者所編造的故事」指稱美國攝製的猶太人大屠殺紀錄片為「政令宣傳片」的歷史脈絡，可見諸本文關於戰後西德同盟國佔領期「再教育政策」的討論；檢察長以「在紐倫堡都解決了」作為反對萊德曼追究納粹戰罪的司法體制因素，由戰後初期紐倫堡大審相關分析可以見之；1950年代末德國年輕世代對猶太人大屠殺集體無知、鮑爾稱「公部門到處都是納粹，大尾到小咖，無所不在」之說法，以及檢察長說「連艾德諾總理都表示過了，該為這不幸事件畫上底線，審訊將是毒藥」等呈顯時代氛圍的西德內政因素，均與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記憶政治的論證相呼應；美軍軍官角色以德國人與美國人都不想碰猶太人大屠殺，因兩國在冷戰時期的共同敵人都是蘇聯，而勸阻萊德曼繼續調查奧許維茲集中營情事的「北約」國際政治緣由，則可徵諸戰後冷戰國際政治之追溯；檢察長以「這類營區隨處都是」、「美國跟俄國也有」為由力阻萊德曼偵辦奧許維茲集中營武裝黨衛隊隊員罪行之集體心態基礎，亦可詳見本文於戰後德國大眾以戰俘為核心的二戰受害情結之考察。

由本文可證，在終戰七十週年前夕問世的《沈默迷宮》虛實交織，不但是德國戰後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也是傳真表達艾德諾時期德國官方與大眾認知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心態之歷史情境與時代趨勢的

¹²⁶ 關於鮑爾之生平及其戰後從事揭露猶太人大屠殺真相而衍生之爭議性，可參閱：Ronen Steinke，王榮輝譯，《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臺北：臺灣商務，2020）；相關電影可賞析：Lars Kraume, dir., *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 2015.

大眾歷史文本。在臺灣「大眾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周樑楷從歷史意識的視角闡釋其意涵，並指出「人人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和觀點表述私領域與公領域的歷史」，¹²⁷故人人具史家潛力，並進而將「大眾史學」定義為大眾的歷史(history of the public)、寫給大眾閱聽的歷史(history for the public)、由大眾書寫的歷史(history by the public)，且稱文字、影像、語音、文物、數位多媒體皆可為大眾史學表述形式。¹²⁸據此，本文探究的《沈默迷宮》，不但是演繹、呈現艾德諾時期德國大眾認知、記憶或遺忘猶太人大屠殺態度取向的歷史文本，也是製作給大眾閱聽的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相關歷史文本，更是由電影編導作為大眾史家所書寫的歷史文本。

但是，如何解釋《沈默迷宮》此一非學術性大眾歷史表述文本中的虛構性呢？周樑楷在從事「影視史學」學理探討時，肯定虛構性影視與文學性文本的「傳真」意義，而此一提議值得借鑑。¹²⁹尤其，他指出「人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和傳達的成果」此一歷史定義中，其認知層次屬於「求真」，而其傳達層次屬於「傳真」，並提出介於「實中實」與「虛中實」的虛實光譜分析架構。其中，虛構性、想像性文本如歷史電影等「虛中實」歷史文本，在虛構人物與情節中仍能反映個人生命經驗、歷史情境與時代趨勢。¹³⁰據此，《沈默迷宮》不但是具體化並承載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文化記憶媒介，也是反映德國艾德諾時期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下大眾生命經驗、歷史情境與時代趨勢的傳真性大眾歷史文本。

¹²⁷ 周樑楷，〈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克麗歐的轉世投胎：影視史學與大眾史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 183；〈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一文原出版於《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論集第一冊》（臺中：采育出版社，2004），頁 23-36。

¹²⁸ 周樑楷，〈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臺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臺北，1999.06），頁 187-188。

¹²⁹ 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頁 445-470。周樑楷將「影視史學」定義為一種「以靜態的或動態的圖像、符號，傳達人民對於過去事實的認知」，並將「歷史」重新定義為人們對過去事實認知和傳達的成果，而其形式即包括口語的口述傳統、書寫的歷史劇與歷史小說，以及圖像式的影視與電影，相關討論請參閱：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頁 447、450-454。

¹³⁰ 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頁 455-456。

第三，本文之論證亦清楚體現戰後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多元性與變遷性。正如「選擇性記憶」德國二戰苦難與「選擇性遺忘」猶太人大屠殺形同硬幣之兩面，艾德諾時期主流記憶文化與另類記憶文化也儼然硬幣之兩面。雖一面以迴避與沈默姿態忽視猶太人大屠殺，而另一面轉而強調德國人的二戰集體受害苦難，構成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主流，但並非意味同時期的西德沒有其他「雜音」潛伏。相對地，積極呼籲正視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對抗性記憶文化，也以社會民主黨政治論述傳統與諸如伯爾和葛拉斯的小說等文藝創作等文化記憶媒介形式，呈現不同於主流記憶文化的另類「異聲」，也足見西德自 1969 年以來至 1970 年代社會民主黨執政時的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在艾德諾時期已有脈絡可循，而相關小說創作內容之探析與詮釋，實可延伸再探，尤其是葛拉斯於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創作的《鐵皮鼓》、《貓與鼠》與《狗年月》等「但澤三部曲」及其他小說如《蟹行》(Im Krebsgang, 2002)，¹³¹橫跨戰後德國近五十年，從中可洞察期間德國猶太人大屠殺的歷時細微變化，且對照其回憶錄《剝洋蔥》或可探究其長年對其自身納粹黨衛軍生命經驗保持沈默的宏觀脈絡。

同樣有脈絡可循的是戰後西德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在艾德諾時期後期也開始在司法領域出現微幅轉向，猶如《沈默迷宮》所演繹的奧許維茲集中營調查與法蘭克福大審之開啟。雖大部分德國大眾以冷漠面對紐倫堡大審、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同樣態度看待奧許維茲集中營罪行調查與法蘭克福大審，但自 1960 年代初以來如《沈默迷宮》中的資淺檢察官萊德曼一般，誕生於 1930 年代左右或之後而較未涉入納粹戰罪的德國新世代，逐漸開始質疑、批判並挑戰艾德諾時期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雖仍無法撼動，但已打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的潘多拉盒子，而呈現逐漸而緩慢的轉變，且於 1960 年代末學生運動對權威的反抗與對自由的追求聲浪中達到高潮，終浮現 1969 年以來至 1970 年代社會民主黨時期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

然而，在戰後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於艾德諾時期後期的「轉向」過程中，法蘭克福大審並非唯一展現於司法領域的契機。1961 年，在以色列舉行的艾希曼大審，也具重要意義。在 1960 年代之前，由於艾德諾官方記憶文化

¹³¹ Günter Grass, 蔡鴻鈞譯, 《蟹行》(臺北:時報出版, 2003)。

的主宰性，猶太人大屠殺除了以幽微、隱喻的文藝形式再現，主要以口述形式於私領域傳遞於倖存者及其親友社群之間，難以見容公共領域的討論，故鮮少針對猶太人遭遇的非人道迫害進行具體討論。因為，除了德國大眾的集體受害苦難情結，一旦深入討論，便牽涉納粹時期德國集體「合作者」或「旁觀者」的道德問題。是故，在以色列進行的艾希曼大審，其相關細節資訊也僅少部分披露於德國社會大眾之前，而且相關資訊經選擇而瑣碎不完整，實難以掌握猶太人大屠殺的完整樣貌，何況德國大眾並不樂見此類戰犯審判。因此，艾希曼大審並未引起德國國內輿論熱烈關注。雖然如此，艾希曼大審確實讓猶太人大屠殺及其受害者遭遇逐漸脫離邊緣化的狀態，並隨著之後的法蘭克福大審，逐漸出現在德國公共領域大眾傳媒的報導與評論。

此外，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一書中對艾希曼大審的批判也具重要意義，雖相對於國際間的熱烈關注，德國大眾的反應冷淡。¹³²鄂蘭在《平凡的邪惡》一書中指出，猶太人大屠殺與德國悠久的反猶太傳統較無關係，而與具種族主義傾向的極權主義政治密切相關。由此延伸，鄂蘭認為艾希曼只是納粹政權下普遍行為模式的表徵，並認為整個德國社會少有針對像艾希曼一樣的罪行提出批判與反對。更要者，她否定艾希曼具反猶太主義傾向，而只是一個在納粹政權時期從事公職服務的無知野心家，且因緣際會參與了納粹大屠殺，只是「平凡的邪惡」的一個表徵。¹³³雖然鄂蘭之論未受到當時德國大眾的歡迎與接納，但就艾德諾時期官方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發展而言，《平凡的邪惡》的重要意義，在於其引起世人對於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的注意與反思，並顛覆了戰後德國占主流地位的德國集體無知與集體無罪論述。

無論如何，艾希曼大審與法蘭克福大審，讓長久以來隱沒於主宰性論述下被壓抑的另類聲音得以逐漸出現在公共領域的討論，有利西德大眾瞭解猶太人大屠殺具體情貌，並在新世代對艾德諾時代主流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

¹³²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New York: Viking, 1964); 臺灣中譯本為：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北：玉山社，2013)。

¹³³ David Cesarani, *After Eich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Holocaust since 1961*, 5-6.

的批判與挑戰之下，隨著德國政治結構的轉變，進入到社會民主黨時期的積極面對與悔罪，而限於篇幅，兩次大審也需另文深入具體考察。

自 1969 年起，由布蘭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贏得國會大選，與自由民主黨組成執政聯盟，取代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執政黨，西德官方也開始轉向積極正視猶太人大屠殺。爾後，布蘭特總理，在國內推動民主化政策，對外則採取「新東方政策」外交路線，涉及官方對納粹戰罪與猶太人大屠殺態度的調整，而艾德諾時期潛伏的另類記憶文化也因此得以浮現，進而成為主流記憶文化，促成戰後西德在 1970 年代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之變異。相對地，艾德諾時期以迴避與沈默之態度、常態化與相對化之歷史解釋、強調以戰俘為核心的德國集體二戰受害苦難經驗的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隨著左派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的隱沒與浮現而時有起伏，並再度見諸 1980 年代基督教民主聯盟柯爾執政的「新保守主義」時代，尤見諸「史學家論戰」期間。是故，從戰後至二十一世紀初，德國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文化持續在「不可能完全記憶」與「不可能完全遺忘」之間擺盪，而此般德國經驗也說明，國家暴力與侵害人權暴行相關歷史與記憶之恢復，其路程漫長而崎嶇，並無捷徑可言，而凡此種種，都猶待進一步深究。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中文專書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先覺出版社，2016。

Hannah Arendt，施奕如譯，《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臺北：玉山社，2013。

Daniel Gordis，胡宗香譯，《以色列：猶太民族的千年建國之路》，臺北：聯經，2023。

Günter Grass，魏育青等譯，《剝洋蔥》，臺北：時報出版，2009。

Günter Grass，蔡鴻鈞譯，《蟹行》，臺北：時報出版，2003。

Günter Grass，蔡鴻君、石沿之譯，《貓與鼠》，臺北：貓頭鷹，2001。

Günter Grass，刁承俊譯，《狗年月》，臺北：貓頭鷹，2001。

Günter Grass，胡其鼎譯，《鐵皮鼓》，臺北：桂冠，1993。

Ronen Steinke，王榮輝譯，《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臺北：臺灣商務，2020。

(二) 西文專書

Adelsberger, Lucie. *Auschwitz: A Doctor's Story*, trans. Susan H. Ray.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1995.

Adler, H. G. Hermann Langbein, and Ella Lingens-Reiner, eds. *Auschwitz: Zeugnisse und Berichte*.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2.

Arendt, Hannah.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ew York: Viking, 1964.

- Baldwin, Peter, ed., *Reworking the Past: Hitler,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90.
- Biess, Frank. *Homecomings: Returning PO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feat in Postwar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Berger, Stefan. *The Search for Normal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Germany since 1800*.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7.
- Borchert, Wolfgang. *The Man Outside*, trans. David Porter. New York: New Direction, 1971.
- Bracher, Karl Dietrich. *The German Dictatorship*, trans. Jan Steinberg. New York: Praeger, 1970.
- Cesarani, David. *After Eichman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Holocaust since 1961*.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Conrad, Sebastian. *The Quest for the Lost Nation: Writing Histor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Translated by Alan Nothnagl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Craig, Gordon. *The Germans*.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1982.
- Dawidowicz, Lucy. *The Holocaust and the Histori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Fischer, Fritz. *War of Illusions: 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 Translated by Marian Jackson. New York: Norton, 1975.
- Fischer, Fritz. *Krieg der Illusionen: 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1914*. Düsseldorf: Droste, 1969.
- Friedländer, Saul. *Memory, History and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Jews of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Friedrich, Jörg. *The Fire: The Bombing of Germany, 1940-1945*. Translated by Allison Brow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Goldhagen, Daniel Jonah.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Knopf, 1996.
- Herf, Jeffrey. *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Jaspers, Karl.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lated by E. B. Ashton. New York: Dial Press, 1947.
- Kogon, Eug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Translated by Heinz Norde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0.
- Konrad H, Jarausch, and Michael Geyer. *Shattered Past: Reconstructing German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Kühnl, Reinhard. *Das Dritte Reich in der Presse der Bundesrepublik*.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6.
- Kraus, Ota and Erich Kulka. *Die Todesfabrik*. Berlin: Kongress, 1957.
- Krimmer, Elisabe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r in German Literature: From 18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Low, Alfred D.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ier, Charles S. *The Unmasterable Past: History, Holocaust, an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Meincke, Friedrich.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Eberhard Brackhaus Verlag, 1946.
- Meincke, Friedrich. *German Catastrophe: Reflection and Recollection*. Translated by Sidney Bradshaw Fa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Mitscherlich, Alexander a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 *The Inability to Mourn: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 Behavior*. Translated by Beverley R. Placze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 Moeller, Robert G.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Nonn, Christoph. *Theodor Schieder. Ein bürgerlicher Historiker im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Droste, 2013.
- Pendas, Devin O. *The 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 1963-1965: Genocide, History, and the Limits of the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othfels, Hans.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 An Assessment*. Translated by Lawrence Wilson. London: Wolff, 1961.
- Rothfels, Hans. *Die deutsche Opposition gegen Hitler; eine Würdigung*. Krefeld: Scherpe-Verlag, 1951.
- Rückerl, Adalbert. *The Investigation of Nazi Crimes, 1945-1978: A Documentation*. Translated by Derek Rutter. Heidelberg: C. F. Muller, 1979.
- Ritter, Gerhard. *The German Resistance: Carl Goerde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Translated by R.T. Clark. London: Praeger, 1958.
- Ritter, Gerhard. *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54.
- Scheffler, Wolfgang. *Judenverfolgung im Dritten Reich, 1935-1945*. Berlin: Colloquium, 1960.
- Shandley, Robert R., ed. *Unwilling Germans? The Goldhagen Deb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Tovy, Jacob. *Israel and the Question of Reparations from Germany: Post-Holocaust Reckonings (1949-1953)*. Boston: De Gruyter, 2023.

Wittmann, Rebecca.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三) 中文期刊或專書論文

周惠民，〈德國現代史論述中的幾個爭議及修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6 期(臺北，2006.11)，頁 233-257。

周樑楷，〈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克麗歐的轉世投胎：影視史學與大眾史學》(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23)，頁 179-192。

周樑楷，〈大眾史學的定義和意義〉，《人人都是史家：大眾史學論集第一冊》(臺中：采育出版社，2004)，頁 23-36。

周樑楷，〈影視史學：理論基礎及課程主旨的反思〉，《臺大歷史學報》，第 23 期(臺北，1999.06)，頁 445-470。

孟鍾捷，〈統一後德國的身份認同與大屠殺歷史爭議——1996 年“戈德哈根之爭”〉，《世界歷史》，第 1 期(北京，2015.01)，頁 55-68。

胡昌智，〈戰後七十年間德國學政界的歷史反思〉，《國史研究通訊》，第 10 期(臺北，2016.06)，頁 81-90。

潘宗億，〈歷史記憶研究的理論、實踐與展望〉，收錄於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臺北：聯經，2019)，頁 247-283。

潘宗億，〈新德國國族記憶空間之建構：以柏林浩劫紀念碑為中心的探討〉，《南開史學》，第 2 期(2019)，頁 246-282。

(四)西文期刊或專書論文

- Adenauer, Konrad.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In Karl-Rudolf Korte, ed., *Das Wort hat der Herr Bundeskanzler: Eine Analyse der großen Regierungserklärungen von Adenauer bis Schröder*, 277-298. Wiesb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2002.
- Adorno, Theodor. "What do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Mean?." In Geoffrey Hartman, ed., *Bitburg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114-129.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Assmann, Jan and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65 (1995): 125-133.
- Borries, Bodo von.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 no.1 (2003): 45-62.
- Conrad, Sebastian. "Entangled Memories: Versions the Pas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5-2001."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8, no.1 (2003): 85-99.
- Cory, Mark.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Role of Violence in the Late Prose of Heinrich Böll." *University of Dayton Review* 19, no.2 (1988): 43-53.
- Frank Finlay, "Ein Schriftsteller, der funktioniert, ist keiner mehr': Heinrich Böll and the Gruppe 47." In K. Stuart Parkes and John J. White, ed., *The Gruppe 47 Fifty Years on: A Re-appraisal of Its Literary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105-127. Atlanta: Rodopi V. K., 1999.
- Halbwachs, Mauric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Francis J. Ditter, 50-87.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 Halbwachs, Maurice. "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 In *On Collective Memory*, trans. Lewis A. Coser, 35-18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Herf, Jeffrey. "Politics and Memory in West and East Germany since 1961 and in Unified Germany since 1990." *The Journal of Israeli History* 23, no.1 (2004): 40-64.
- Herf, Jeffrey. "The Holocaust and the Competition of Memories in Germany, 1945-1999." In Dan Michman, ed.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9-30.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 Heuss, Theodor. "Speech 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Memorial for the Victims of Bergen-Belsen, November 1952." In Roderick Stackelberg and Sally Winkle, ed., *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 An Anthology of Texts*, 401-402.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Lorenz, Chris. "Border-Cross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on the Role of German Historians in Recent Public Debates on Nazi History." In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59-94.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 Lüdtke, Alf.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Past': Illusions of Remembering, Ways of Forgetting Nazism in West German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5 (1993): 542-572.
- Margalit, Gilad. "Divided Memory? Expressions of a United Germany Memory." In Dan Michman, ed., *Remembering the Holocaust in Germany, 1945-2000: German Strategies and Jewish Responses*, 31-42.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 Moeller, Robert G.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e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1996): 1008-1048.
- Olick, Jeffrey K. "What Does It Mean to Normalize the Past? Official Memory in German Politics since 1989."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2, no.4 (1998): 547-571.
- Rothe, Anne. "The Third Reich and the Holocaust in East German Official History." In Louise O. Vasvári and 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 ed., *Comparative Central European Holocaust Studies*, 79-94.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9.

(五)報紙

Heuss, Theodor. “Heuss weicht Mahnmal in Belsen ein: Der Bundespräsident gedenkt der Opfer des ehemaligen KZ.” *Frankfurter Rundschau* (Frankfurter), December 1, 1952, 1.

(六)網路資料

「數字(The Numbers)」網站，<https://www.the-numbers.com/movie/Im-Labyrinth-des-Schweigens#tab=international>，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Adenauer, Konrad. “Regierungserklärung vom 20. September 1949,”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978-3-322-90251-1_11.pdf, 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Fuhr, Eckhard. “Auschwitz? Ich wusste herzlich wenig,” *Die Welt* (Berlin), November 5 2014, <https://www.welt.de/kultur/kino/article134029933/Auschwitz-Ich-wusste-herzlich-wenig.html>, 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Riebsamen, Hans. “Viele Filmhelden und ein echter Held,”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rankfurt), November 6 2014, <http://www.faz.net/aktuell/rhein-main/im-labyrinth-des-schweigens-ein-echter-held-13250264.html>, 擷取日期：2017年7月24日。

“A Place of Remembrance,” *Gedenkstätte Bergen-Belsen*, <https://bergen-belsen.stiftung.de/en/history/placeofremembrance/>, 擷取日期：2023年10月25日。

“Die Jungen denken anders,” *Der Spiegel* (Hamburg), 19 (May 8 1995), <https://www.spiegel.de/politik/die-jungen-denken-anders-a-171b56e6-0002-0001-0000-000009184264>, 擷取日期：2023年10月25日。

Swedish Academy,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9: Günter Grass,”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99/summary/>, 擷取日期：2020年5月31日。

(七)數位媒體

Ricciarelli, Giulio, director, 《謊言迷宮》, 臺北：海鷗，2016。

Kraume, Lars, director, *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 2015.

**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 The Making and Vicissitude of
the Memory Culture of the Holocaust in Post-War Germany
from 1949 to 1969**

Pan, Tsung-yi

Full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politics of memory culture of the Holocaust in Post War Germany from 1949 to 1969.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ovie *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 which was released by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nd of Second World War, it firstly intends to show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memory culture of the Holocaust in the period of the rules of Konrad Adenauer (1876-1963) and his successors, Ludwig Wilhelm Erhard (1897-1977) and Kurt Georg Kiesinger (1904-1988), who belonged to 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of Germany,. Secondly, it looks into the contex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age of Cold War in which the official memory culture of the Holocaust took shape under the regime of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from 1949 to 1969 by examining related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state elites discourses, journal reports, oral interviews, artistic works such as historical films and novels as well as academic works with regard to the war crimes of Nazi and the Holocaust. In doing so, this article also attempts to trace the popular discourse of German as victims of World War II in the 1950s-1960s and analyze how the Adenauer's government manipulated that discourse for

its political demands during the period of Cold War. Then, it turns to demonstrate the alternative memory culture of the Holocaus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the rules of the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by briefly addressing the counter discourses by Karl Jaspers (1883-1969), Kurt Schumacher (1895-1952), Fritz Fischer (1908-1999) as well as Heinrich Böll (1919-1985) and Günter Wilhelm Grass (1929-2015), which paved the shift to the official memory culture of the Holocaust under the regim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in the 1970s, in order to show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German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difficult past of Nazi.

Key Words: Holocaust, Konrad Adenauer, 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 memory culture, public history

